

620

# 煎餅

——抗日与軍食

馮玉祥著



1935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9287B



煎餅

——抗日興軍食——

馮玉祥著



1935

# 序

自二十二年民衆抗日同盟軍被迫解散以來，直接的抗日戰爭，已經暫時地消沉下去；「中日滿」的「親善」與「提攜」，却已成爲中國政治軍事的根本方針。然而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問題並不能因親善論者的詐欺和幻想，而得着苟且偷安的「瓦全」，反之鐵般的事實，却已指明了一步步引狼入室的提攜政策，不僅東北四省棄之如遺，華北五省作了親善的禮物，並且整個的中國，無論物質上或是精神上，都在快步的走入亡國之途。這種慘酷的現實，逼迫着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不得不將民族生死問題仔細思索一番；逼迫着每一個有民族意識的人，因爲對現實之更深刻的认识，而欲發爲堅決的奮鬥行動。總之，歷史的現實的一切，都是愈加明顯地指示着中國只有在，並且必然在，民族革命戰爭的決死奮鬥中，才能

打開一條出死入生的光明大道來了。

我因察東抗日戰爭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因目前客觀形勢的要求，不能不就實際與理論的研究，以求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問題的一個正確的解決。研究的結果，已經寫了中國與二次大戰一書，那是著重在國際和國內的一般形勢和我們應有的各方面的準備。現在的這一本小書——煎餅，則著重於抗日戰爭的理論基礎和軍食這一具體問題的計劃，所以本書的大半篇幅是敘述煎餅和煎餅糧食的生產，製造，化學分析，及其與軍食民食的關係和具體的計劃等等。同時亦用了相當的篇幅，系統的闡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歷史的現實的原因，民族革命戰爭中整個的政治經濟問題所應取的政策，並且對於各種引導中國走上死路的謬誤的策略線，亦給以必要的深入的批判。我所以要採取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因為我認為只有這樣，方可使理論與實際完全綜合起來；使我們的具體計劃，完全建立於理論基礎之上；而同時又可以免除純理論的空談，以及無原則無前途的實際主義之錯誤。

當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想到帝國主義者的殘暴行爲不由我不憤怒，想到認

賊作父者的媚外的無恥的行爲，不由我不痛恨，——其實這亦是每一個有民族意識的民衆所應有的憤怒與痛恨——所以在字裏行間，不免有些不可克制的感情的流露，當然這決不是意氣的衝動，而是經過理智洗滌了的人類應有的精神之表現。所以在這裏，我們的情感是熱烈的，我們的態度是嚴肅的，我們的精神是奮鬥的。此處所說的話，沒有各種各式的逃避和幻想，沒有閒情逸致的幽默，也沒有避難就易的投機取巧。我們所說的話，只是每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所想說的老實話，和每一個應該負擔起國家社會之職責者的意見。如果要說我們曾經明確地堅持了一個一貫的原則，那末這個原則，只是歷史的現實的客觀環境必然發展出來的結論，同時，亦是中國民衆拚死以赴的任務和目標罷了。

在這裏、爲便於讀者明瞭起見，我應該將書中的幾個重要觀點，再提出來說一下：

第一，「九一八」國恥的發生，不單是基於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慾望，同時亦是我國統治者一貫媚外的不抵抗主義的結果。換句話說，由「寧贈朋友」到「攘外必

先安內」的國策之發展過程，同時即是帝國主義者得寸進丈的侵略之發展過程。這是近百年的歷史事實已經切實證明的了。反之，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不但是當前國難的一條唯一的出路，並且是急待完成的一件莊嚴的歷史任務。

第二，在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下，任何形式的提攜和親善，結果都只是助成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實現，而淪中國於永久被宰割的保護國或獨佔的殖民地。另一方面，欲依賴另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者，以對抗或制裁日本，其結果亦不過加深中國的國際殖民地化，並促進帝國主義者間爭奪中國的戰爭。這種捨棄自己的奮鬥，而認賊作父或「以夷制夷」的政策，均與中國之領土完整的自由平等運動絕對相背。反之，唯一的正確政策，只有在自己的頑強抗日戰爭過程中，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的作消滅帝國主義的奮鬥。

第三，中國革命運動的最終目的，必須歸結到國民經濟的澈底改造。但是經濟的改造，必須有政治的先決條件，而政治問題的解決，又須有經濟的基礎。所以中國國民經濟的改造首先須為爭取政治的先決條件而奮鬥，同時政治問題，解

決過程中，亦須爲經濟的改造或準備改造的條件而努力。抗日戰爭既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主要一環，同時亦就是改造中國國民經濟的先決條件。所以「抗日，一切問題有辦法有希望」「一着活全盤皆活」的說法，就是用在這樣的範疇上的，並不是以抗日代替一切。

第四，有些人絕對的否認中國有抵抗的力量，另外又有些人虛妄的誇張「中國必不亡」。這兩者形式上雖有悲觀樂觀之不同，可是實際上不同的只是：前者是甘心作亡國奴，後者是等待作亡國奴而已。我們正確的研究歷史和現實的結果，應該肯定地承認，只有民衆的力量，才是中國抗日和甦生的力量。這種民衆的力量，並不是一旦會從天掉下來的奇蹟，而是那些被壓搾被賤視的工農羣衆，在解除束縛的奮鬥和組織過程中，鍛煉和發展出來的。這種力量，歷史上不但有過無數的例證，而且目前也還正在曲折地發展着。這種力量，雖然遭受了帝國主義與少數出賣民族以自利的份子之嫉視和高壓，但是歷史的事實的發展，終必成了爭取中國自由獨立之必然勝利的保證。

第五、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精神和物質的力量，自然需要積極的準備。這種準備，不是延緩到無期的謊騙，亦不是準備到與侵略者平等後方始抗日的幻想。

這種準備，是集中中國目前一切可能有的力量，在發動抗日戰爭的前提與過程之中，完成並改進，並且準備的自身，就是一種艱苦的奮鬥。莊嚴的民族革命之歷史任務，固然必須經過艱苦的奮鬥，鉅大的犧牲，才能完成的。就是煎餅軍食的計劃，亦須經過不斷的奮鬥，才能實現的哩。

總之，這本書內，企圖將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理論基礎和具體的實際準備，給予以現實性和行動上的可能，並且欲給理論與實踐完全統一起來。我知道自己是一個拿槍桿的老粗出身，雖然處處虛心的注意事實和研究，但是恐仍不免有重要的遺漏或錯誤。我誠懇的希望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朋友們，給以正確的指正，而在求民族生存發展的原則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從艱苦的奮鬥中，爭取民族的利社會的自由平等之最後勝利。

# 內容

## 一 抗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國民經濟上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國際關係上的原因——抗日戰爭之歷史上的原因——親日政策是自取滅亡的死路——抗日是中國唯一的生路

## 二 抗日與軍食

抗日準備的意義——軍食與民食——我國民食供給之現狀——民食不足的原因——怎樣解決我國民食問題——抗日的軍食問題——抗日戰爭之時間與戰士的估計——糧食的耕地和產量之統計——糧食資源的估計——我國民食原料的百分比——軍食的三個條件——軍食與乾糧——麵之製作乾糧法——餅乾和炒麵——米之製作乾糧法——皖南的「炒鍋巴」「鍋巴粉」和「鍋巴粉

## 「光餅」——戚繼光剿倭寇的「光餅」

### 三 煎餅與軍食

煎餅之歷史——雜糧與煎餅——煎餅之地理的考察——煎餅之歷史的考察  
煎餅糧食之生產——煎餅糧食的栽培面積與產量——東北四省在糧食生產上  
之地位

煎餅之製造——製造煎餅的工具——石磨之形式及作用——鏊子的作用——  
其他必要的用具——燃料

煎餅糧食之各種配合的分量——煎餅之製造手續

煎餅糧食之養分——普通人的食量——我國人民需要的營養素之標準——煎  
餅糧食之化學成分——煎餅糧食養分與其他糧食之比較——煎餅中的養分  
煎餅與抗日軍食——就煎餅糧食的栽培面積和產量說——就煎餅的耐久性說  
——就煎餅的體積輕小說——就煎餅糧食的價格說——就煎餅的養分說

## 四 抗日軍食的一個計劃

製造和供給軍食的中心地之選定——戰期各階段的抗日戰士之估計——一千萬戰士的軍食之需要量——煎餅軍食的製造——煎餅糧食的供給——石磨的製造和數量——鏊子的製造和數量——煎餅工人的數量和訓練——燃料的需要量和改良——關於計劃的根本認識和精神

## 五 抗日戰爭之應有的認識和前途

中華民族之生死存亡的歧路——抗日戰爭是民族解放之歷史任務——抗日戰爭是中國民衆之心坎裏的要求——國際的援助與自己的決心和努力——從一切生活習慣思想行動上實踐抗日的準備和奮鬥——抗日戰爭的光明前途

# 一 抗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九一八」事變，日帝國主義在二十四點鐘之內，無抵抗的強佔了遼吉兩省，接着又無阻礙的併吞了黑熱兩省。這四省的人口共有三千五百萬人，佔到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共有土地四百萬方里，佔到各省總面積的百分之十五。這種失地喪民的奇恥大辱，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一件事，亦是中華民族存亡的一個嚴重關頭。

這時候，中國人民應學土耳其的榜樣，爲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爲爭取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爭；又要學比利時人民的榜樣，爲反抗帝國主義的凶橫霸道，爲維護人類正義，而盡力抵抗。但是事實上，不抵抗的外交政策，既促成了「九一八」事變之實現；接着不抵抗主義更使日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爲，毫無阻礙的擴大橫行起來；最後不抵抗主義之有計劃的對於民衆抗日運動，對於抗日戰爭之摧殘，而使收復失地的活動，完全歸於失敗；而成爲世仇死敵的中日兩國，反在互

碰香檳的歡慶聲中，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逐漸取得囊括全中國的成功！這真是如何出乎中國和世界民衆的企望之外的一件事！

在事變過去的三年多中，抗日戰爭，固然造成了許多光榮的戰蹟，發揮了許多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但是因為外部的壓迫和內部的缺點，一次次的都被摧殘而告失敗了！然而這是不是證明了抵抗主義的失敗，不抵抗主義的成功？不，決不是的。不抵抗主義的功績，祇是事實上承認東北四省被分割，祇是「通車」「通郵」「通電」，「減低日貨入口關稅」，「償還無擔保日債」以及一切「懸案」等滿足日本單方面之要求；祇是劃定「非戰區」「文化區」，「日盤國百里」，以滿足日本蠶食中國之慾望；祇是摧殘了一切抗日運動，祇是麻痺了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祇是消沉了全國民衆的奮鬥精神，而成爲一種「混吃等死」的亡國心理之潮流！總之，這種不惜犧牲一切以圖暫時的「買靜求安」之不抵抗主義，實際上祇是更加助成日帝國主義的併吞野心，侵略行爲，更加沒有限止的得寸進丈；另一方面，是將「害怕」「媚外」「無辦法」的奴隸心理，代替了民衆的奮

門圖存的民族精神。「買靜求安」的不抵抗政策對於政府之統治地位的維持，有了很大的作用，自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一國政權的樹立和鞏固，必須盡了衛護民族和民衆的利益之責任，才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如果失了或違反了此種責任，即使暫時的取得自身之存在與擴大，而國家由此淪亡，民衆由此永作奴隸，豈不作了萬世的罪人！試問「救國救民」的主義之云何，政府的責任之何在？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不抵抗主義不過是民族的自殺政策，不過是領導全國人民深入亡國奴的道路。反之，抵抗主義雖然遭受了不少的挫折和犧牲，但是抗日戰爭，把「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個人主義打破了，代替以民族意識和團結；把不抵抗主義的媚外心理打破了，代替以「中國也有反抗帝國主義的能力」；把那「等待作奴隸」悲觀心理打破了，代替以「奮鬥就有成功」的燦然前途；把那個人的爭權奪利的私覬觀念打破了，代替以民族的利害就是中國民衆最主要的利益。同時抗日戰爭，證明了祇有一小部分人，是站在日帝國主義的利益方面，而大部分民衆則站在中國民族利益的一方面。總之，三年來鐵般的事實，證明了抗

日是中華民族不作亡國奴的唯一道路。過去的抗日戰爭，雖然失敗了，可是抗日仍然是絕對不可避免的，抗日必然是獲得最後成功的。這可以分成幾點說：

第一，我國自足自給的手工工農業經濟，自帝國主義勢力侵入，已起了一個巨大的變化。這就是一天天變爲帝國主義過剩商品的推銷市場，過剩資本的投放心地，和她們必需原料的取給所。因此，一方面在華外國銀行，把握了中國經濟的最高統治權，把持了商品的輸出和輸入，壟斷了全國的鐵路交通事業，侵佔了許多最好最大的煤鐵礦山，獨佔了許多新式的輕重工業，並且支配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另一方面，輸入的洋貨大都是製造品，輸出的土貨大都是原料。因爲原料價格的上漲，沒有工業品增加的快，而在跌價時又比工業品落得又快又多，致使我國總是拿了很多的土貨，才換得少量的洋貨。其次，帝國主義者多拿洋貨來傾銷，少買土貨回去，所以我們每年又要多拿七八萬萬圓孝敬她們。單計七十年來，由這種多買洋貨上孝敬外國的錢（所謂入超）就已有一百萬萬圓以上了。再次，帝國主義者又在我國放高利債，收利息，開工廠開洋行攫取利潤，拿去的錢

亦很多，大概的計算，三十年來，也共有五六十萬萬圓之多了。總起來說，帝國主義每年從中國榨取去的銀錢，總有十二三萬萬以至十五六萬萬圓之多。這樣，就使農民的手工副業完全消滅，農產品賣不起價，新式工廠發展不起來；或者已有的工廠，統統都是陷於衰落倒閉的危境，或者出賣於帝國主義者同時更延長並加重了封建的剝削。因之，就造成了中國經濟之慢性的及急性的恐慌和破產。這種蝕骨的侵略中，日帝國主義就是最重要的一個。同時，日本對於東北四省的強佔，更使中國經濟受了嚴重的損失，而促進經濟恐慌之深化。我們試一考察東北四省在中國之經濟的地位：四省的耕地面積，共有一萬萬畝，佔全國耕地的百分之十七。四省的荒地面積，共有六萬萬畝以上，佔全國荒地的百分之五十。四省的主要農產物，共有三萬萬擔，佔全國農產量的百分之十六。四省的森林，尤為豐富，共有林地面積四萬萬畝，佔全國林地的百分之三十，而儲量和產量，更佔到百分之六七十。四省的牛羊豬馬驥等，共有三千萬頭以上，佔全國牲畜數量的百分之二十。四省的礦藏，最主要的是鐵藏有八萬萬噸，（比日本多十倍）佔全

國鐵藏的百分之八十，每年鐵礦砂產量在一百萬噸左右，佔全國鐵產的百分之四十。煤藏約五十萬萬噸，（當日本煤藏的百分之六十，但質量特優，）佔全國煤藏的百分之二；每年產煤一千萬噸，佔全國儲量百分之五十二，僅遼寧一省就有五十萬萬噸之多；二十年全國油產量四十六萬桶中，遼寧即有四十五萬五千桶，計佔百分之九十九強。遼寧四省的鐵道約有七千公里，幾佔全國鐵路里數的百分之五十。再從貿易方面看，出入貿易計佔全國貿易總額百分之二十四，而居第二位；出口數額更佔到百分之三十七，爲我國唯一出超之口岸；出超數目，每年自數千萬圓以至二萬萬圓以上。並且在國內市場上，亦佔有重要地位，如東北四省農林產物，常爲國內市場上一個主要供給者，同時東三省又爲製造品的紗布綢茶麵粉等商品之重要市場。由此種經濟數字的指示，可以知道東北四省對於中國經濟的重要關係。現在東四省一旦被日本強迫的從中國分割開去，其給予我國的損失。真是不可計算的。而其促進整個國民經濟之恐慌的深化，更爲不可否認的事實了。所以中國國民經

濟恐慌的發展，雖自有其深長的內外的原因，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益益發展，就是使我國幾千年來固有的經濟基礎，急性地或遲慢地崩潰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種情形之下，使得一切枝枝節節的「補苴罅漏」的工作，毫無效果，並且是幾乎無處着手。這一切歷史的事實，要求着我們從抗日戰爭中來打開一條經濟的出路。這是抗日不可避免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中國的政治狀況，和經濟是一樣的處於附庸的地位。就是一種殖民地的實質。一方面在中國名義上的領域之內，重要的經濟和軍事的區域，樹立了許多「特殊勢力範圍」和軍事堡壘。這些地方，帝國主義者，因有特殊的政治，法律和軍事的權利，不僅中國的主權無所施用，反之，實際上恰是支配和分割中國的中心。特別是日帝國主義憑藉此種特殊權利，以武力佔去中國領土十分之一的東北四省以後，更使中國由依賴於「勢力均衡」的半獨立狀態，進到印度朝鮮繼續的新形勢。這一事件的嚴重意義，不僅是我國名義上的領土縮小了，亦不僅是因為東北四省的被分割而所致的國際地位之低下，最嚴重的是日本一手持着血腥

的槍刀，隨意的分割我國的領土；另一隻手持着「協和外交」的法寶，把我們的土地強佔去了還不算，更要中國承認她是「正義」「和平」的使者，更要中國在她軍事與「和平」的計劃之下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滿洲國」第二，「日滿中共存共榮」下的完全殖民地化。打個比方說，當我們家裏的一個人被虎狼啣在口裏，唯一的辦法，只有聚集全家的人，集中所有可作武器的工具，把被啣去的人奪回來，把虎狼打死或趕出去；如果要同老虎哀求着講「和平」講「合作」講「服從」，以企保全殘軀的話，只有瘋子，才會作這種自誤誤人的蠢事。同樣一個民族正被敵人放在刀俎上彎割的時候，唯一的辦法，亦只有動員全國民衆，集中所有的武器，拚命抵抗，把侵佔的土地奪回來，把敵人趕出去，如果企圖以「不抵抗」的法寶，制止敵人無饜的欲求，甚至於幻想在敵人的恩許下來準備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更是遺禍萬世的自誤誤人之罪惡。在這裏我們不必去拿世界各國興亡的歷史來作證，這種例證真是太多了，就是三年以來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事實之發展，就已充分的告訴了我們：首先不抵抗主義促進了「九一八」

事件之發生，完成了「滿洲國」的發展；接着消滅了抗日運動和抗日戰爭，麻痺了民衆的民族意識；同時，在事實上亦就認許東北四省的「決不收回」；日本的勢力在華北數省一日千里的發展，「通車」「通郵」「通電」「關稅」「債務」以及各種懸案都如日本之欲望而一一解決。澈底媚外主義之發展的結果，必然是日帝國主義要進一步的把統制「滿洲國」的方式，和平的實施於全中國，即是中國政治經濟的完全被征服，和領土之整個的零碎的分割而亡罷了。或者有人說，我國現正處在不「統一」的時代，不「統一」就不能抗日，要抗日必須先「統一」，所以「攘外必先安內」。因此，日帝國主義的猛烈侵略之日，亦正是「安內」的戰爭積極進行之時；並且，不僅對於日帝國主義任何無理的侵略，要採取完全無抵抗的政策，而為謀「安內」戰爭的勝利，更不得不進一步的與帝國主義相妥協；說得不好聽點，就是對帝國主義者投降，以獲得所謂統一之幫助。所以不抵抗主義，從「九一八」事變的發生，發展到「滿洲國」之事實的承認，以至「中日澈底合作」，是為事實的邏輯的必然結果。這種不抵抗的理論與事實

之發展，已經完全證明與中華民族的利益絕對相反的，反之，與侵略的帝國主義之利益，才是親和的。退一步講，亦不能不使人要疑問：第一，國內不統一的原因是甚麼？第二，是否是不抵抗能使國內「統一」，而抗日就使國內「分裂」？第三，與帝國主義者「澈底合作」之下，即使做到「統一」，則這種「統一」，是土耳其式的獨立的中國，還是「滿洲國」式的殖民地？我們可以作一個簡單的肯定答復。國內不統一的原因，是由於經濟，政治，和實力者的極端利己主義，是由於帝國主義之侵略。這些形成不統一的原因，只有在爭取政治經濟之獨立平等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逐漸獲得澈底的消滅，或獲得澈底解決的必備條件；必如此，才能使中國獲得真正的永久的統一。反之，站在買辦階級的利益上，依附於帝國主義以自重的「安內」而不「攘外」，其結果只有增加國內的擾亂和分裂，只有促進完全殖民地化的急速實現。所以不僅大多數民衆的生觀是要求抗日的，即是中國政治之客觀的發展，亦是決定了抗日戰爭之不可避免。這是抗日不可避免的第一個原因。

第三，清末以來，中國曾經在帝國主義之所謂「門戶開放領土完整」政策下，苟延殘喘了幾十年。不過這種「門戶開放」和「領土完整」，是建立於中國的次殖民地地位，和各帝國主義之在華的「勢力均衡」上；所謂均勢之維持，就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均力敵，就是次殖民地地位之深化。這自然與中國之自由獨立的企求，是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可是中國外交上歷來有兩個有力的互用和互鬥的政策，一個是「維持均勢」，具體的說是利用美英以對抗日本；另一個是親密的投降於日帝國主義的懷中。這兩個政策，從李鴻章以來，雖時有倚輕倚重之別，但實是所謂「正義和平」的立國根本方針了。如果說「九一八」事變初期的政府外交方針，是欲利用美英以牽制日本，而維持均勢，那末，現在這一均勢的維持政策，已經明白放棄，而轉入到偏重於「大日本門羅主義」的親日政策了。歷史的事實，證明給我們，這兩個政策的本質上，都是放棄了中華民族利益的立場，而是站在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方面，以維持私人權位之方策。前者的結果，是國際共管的次殖民地地位之深化；而後者是日帝國主義獨佔的殖民地，或

日本「保護國」之完成。日本「四一七」宣言，就是此種政策的出發點和歸結。所以兩者都是促成中國之滅亡的道路，而與爭取中國之獨立平等，南轅北轍，完全相反的。話又說回來，在求中國之自由獨立的過程中，國際間的衝突和助力，並不是不能利用，甚至是必須利用的。但這必須有兩個前提，第一，須是中國自身切切實實的在打算，並且切切實實的在幹，在抗日，然後才能說利用國際間的衝突，然後才能利用國際物質和精神的幫助，而且還要明白，只有我們自動的，頑強的抵抗過程中，才配要求國際的援助。第二，所謂國際援助云者，必須在有利於抗日，至少不妨害於抗日之國際關係的相互利用，換言之，即是「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決不能幻想着人家來替我們「打抱不平」，更不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迎彼拒此。單靠人家善意的打抱不平，是現世界上沒有的事，如果存此幻想，則不僅會失望，而且會有認國際助力是不可靠之錯誤；否則又會踏襲了李鴻章的「以夷制夷」的覆轍，使中國永遠轉輾於「爲夷所制」之下，非至完全亡國不可。同時，這又不能爲任何人所藉口，說是國際的援助和衝

突，既都靠不住，還是回過頭來澈頭澈尾的投降到一個帝國主義懷抱中，死心塌地的作一國之奴隸，作一國之「保護國」；這樣的「革命外交」實不過重複着袁世凱段祺瑞的政策罷了。所以我們為利用國際矛盾和援助，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間，不至於淪入完全被宰割的地位，而能澈底的爭得中國之自由，就要以抗日戰爭，為我國發動世界反對日本的大戰和日本國內革命戰爭之契機。這是抗日之不可避免的第三個原因。

第四，有些人以為中國如與日本作戰，「十日之內，必為日本所滅亡」的說法，作為反對抗日，同時作為「親日」之理由。在這些人的主觀上，或許還是想着現在既無「抗日的準備」，還是和日本敷衍敷衍好了；一面「敷衍着日本」，一面來「大規模的準備」，等過了三十年五十年，利用機會一下子打倒了日本，就可以報過前仇。其實這個想法，完全錯誤了，姑無論凶狠狡滑的日本，不是個傻子，容許我們這樣幹，況且所謂什麼「提攜」者，必須是日本要什麼，我們就給什麼的「買靜求安」；在「提攜」的過程中，日本必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各方

面，一步步的增加勢力，一步步的獲得保障，一步步的把中國統制於日本勢力之下，到那時候，「白米煮成熟飯」作殖民地作亡國奴的「百年大計」，已經完成，親日者的「幻想」，一切落空。須知道印度，埃及，和朝鮮等國的滅亡，就是經過這麼一個「提攜」「合作」的過程的。所以帝國主義單方的「合作」，不過是使中國完全殖民地化的一個手段，我們的親日黨人，現在不過重複着朝鮮的滅亡覆轍罷了！打個粗俗的比方說，女人嫁人，必須在出嫁之前，打定主意，認定對方是不是可以作為終身的伴侶，否則出嫁以後，就會變成「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還說什麼自己的「平等自由」，「報仇雪恨」呢？因此，他們的錯誤，根本上是沒有抗日的決心，其次又把日帝國主義的勢力看成無限制的强大和鞏固，另一方面，又把中國看成沒有一點力量，沒有一點辦法，並且又用了「泰山壓頂」的力量，和詭變萬端的計謀，把自動的抗日勢力和運動，縊殺了下去，拿害怕和奴隸心理來催眠了民衆的民族意識，消沉了奮鬥精神：於是我們的親日者，猶如魔術師一般，得意的說：「你看，中國有什麼可以抗日呢？中國祇有一

塊一塊的供人侵佔的土地，一個一個作人奴隸的老百姓；可是日本呢，是那末高不可測，大不可量，有用不完的槍械，使不盡的金錢，和那一日千里發展着的勢力；因此，中國只有趕快的永遠的拜服在木屐兒底下，用奴隸的忠誠和勞役，或者可以誠格主人，允許我們多活幾天；不然的話，十天，不，十天之內就要滅亡哩」！這種對日帝國主義的害怕心理，這種甘心願意的奴隸意識，戳穿了說，不過是買辦階級的階級意識之政治上的反映，換句話說，就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勢力之下，分沾餘潤的買辦政策之政治的強化而已。但是真理和事實，都不是如此，大多數民衆的要求，亦不是如此。在這裏我們不必去說日帝國主義的空虛和其國內革命之必然的爆發，以及她的國際衝突之不可避免；我們現在只研究中國一方面的事實。第一，現階段中日兩國的國力和軍備，自然是相差甚遠；但是以在日本控制下的中國，幻想實力的準備到與日本一樣的平等，而充實，那是决不可能的。因為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中國如要買一條槍，日本就可以造一千條槍，中國買一架飛機，日本就可以造一百架飛機，這樣的結果，中國不但永遠趕

不上日本，而且相對的勢力之懸隔更加增大：況且日本還有勢力可以不許中國買一條槍一架飛機呢！第二，中國的老百姓，並不是本質的沒有奮鬥精神，沒有組織力量；其所以不能表現力量的，恰又是自古以來統治者們的壓迫和催眠所致。這不是有各地風起雲湧，頑強的抗日鬥爭的事實證明了嗎？第三，就中國的軍備和作戰力說，上海、長城及察哈爾之抗日戰爭，不僅沒有軍備最好的軍隊參加，實際上還受了國內的壓力和阻礙，但是作戰的時間，都已在一二月以上，比那「十天的預言」，都已多過了幾個「十天」，並且中國並不會因此而滅亡。總起來說，中國是已有了相當的抗日力量，並且在內外的壓迫之下，已有不怕失敗不惜犧牲的抗日運動。這種力量，自然是萬分需要充實，發展和鞏固的。不過這須在抗日的前提下，從鬥爭的過程中，才能充實，發展和鞏固的。這決不是感情的衝動，徒快意氣，而是中國從滅亡的威脅中爭取自由獨立的百年大計。這是抗日不可避免的第四個原因。

在這裏我們不能用較多的篇幅，來充分討論「抗日」「降日」的理論和利

害。我們在這個緒言的最後，扼要的來說一說轟動世界的「中日親善」或「中日提攜」。關於這個問題，張熙若先生在三月十日的大公報星期論文上有一篇文章，說得很好，今抄引幾句：

「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無端的侵佔了人家四省的地方，用飛機重炮轟燬了人家許多城市和人民，擾亂了人家許多地區，而且日日計劃如何吞併，如何宰割，簡單的說，就是處處要置人家於死地，人家無力抵抗，也就罷了，却還要進一步強他和你講親善，講提攜，這未免太難了！天下事更奇怪的乃是：土地被人佔了很多，人民被人殺了很多，刦餘的性命還是朝不保夕，在岌岌可危的情勢下，有些人竟然一聞人誘以親善之詞，謊以提攜之說，便似乎欣然色喜，以為好了，有辦法了，「今日演說惟恐不親，明日訪問惟恐不善」，這未免更難了！人於侵略之後來講親善，自然是於「傷害之上加以侮辱」，我於被侵略之後，甘心和人去講親善，豈非表明不但無力抵抗，並且情願受侮？若是這種甘受之侮是「含垢忍辱」之類，有重大作用，或特別苦心在內，那還可說，不過在今日彼此

懸殊情勢下，任何作用，假如有的話，都不能發生効力，任何苦心都不能達到目的；惟一的結果只是上當，受騙，使國難愈加嚴重，國運愈難挽回。』

張先生的話，雖然很委婉，可是已很明顯的告訴了我們，「九一八」三週年後的今日，還來講「親善」講「提攜」，無論有什麼「苦心」什麼「作用」，而結果必然更加促進日帝國主義對中國之統制，以及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瓜分運動之急進。換句話說，就是使中國踏入殖民地化的更高一個階段。其次，我們要補充的，就是什麼「親善」和「提攜」，固然一方由於日本之主動，同時，實即不抵抗主義之必然的發展和歸結。不然的話，此種「口蜜腹劍」的親善論，何至於引起「今日演說惟恐不親，明日訪問惟恐不善」的醜行呢？其實，日本所提示的「提攜」政策，連面目上也沒有改變其侵略的本色，那能談到「化仇敵爲親善」？我們對於「中日親善」，必須有深刻而清晰的認識，才不至「人云亦云」的上了大當。

一、以「大亞細亞主義」實現獨佔東亞的「大陸政策」，是日本統治階級一

致的基本意志。所謂日本國內之政策的爭論和轉變，不過是實現方式的某種歧異，換句話說，只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各種侵略方式有暫時的倚輕倚重之區別而已。如果忽略或故意隱蔽這種本質的認識，則沒有不如張先生所說「將何以自異於二十一條時的袁世凱政府」了。其實，日本的此次所謂轉換方向之目的，除了中國一部份買辦意識的份子，粉飾些無抵抗的「大同想理」外，日本統治者自身就公開承認這不過是更積極的侵略政策。我們這裏且引證日本衆議會外交家之蘆田均在東洋經濟新報社談話會上之結語：「日本今日之國力——國力中包括經濟力，武力及其他——尚不足吞併中國四百餘州。日本之國力，既不足吞併中國四百餘州，自應於消化方面發展，乃為當然趨勢。又以不能消化之體力，而吞併無由消化之大物，實為不利之政策。今後十年二十年之中，若日本仍能以今日破竹之勢，向前發展，則實力即強，在實力未充以前，日本就應隱忍，以待時機。至於日本之對華政策，余以為即應以此為基礎。要之，問題之解決，唯依實力。在日本實力未充以前，中國四百餘州，應與世界各國共同通商貿易，且在

此時期之中，亦有與中國協力開發產業之餘地也」。

二、因此，所謂中日合作之政治的方面，在承認「滿洲國」之基礎上，並進而與日本建立「一個系統與連鎖關係之集團」，而根本排除中國人民之排日思想，如日本外交部情報部長中山優所說：「故今後日本對中國之關係，似非對立如今日之純粹的國際關係，而實為一大單位之關係。猶滿洲之獨立，形式上雖稱東洋多一「獨立國」，然此「獨立國」，究非排日的「獨立國」，蓋今日之東洋，不能有所謂「獨立國」故也」。

三、這種日本在中國的最高統制權之擴大與鞏固，是要建立於「中日經濟之提攜」上。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是要使中國為日本之工業品（特別是棉織品、雜貨、機器等）的市場，和原料（特別是棉花、鐵礦砂、皮毛等）之供給地，以至進而作財政、金融、技術、軍事等之人的和物質的援助。這種提攜之目的，如中山優說，是使「中國方面，產業之向上發展，斷不能毫無統制，毫無條件，以與日本產業衝突，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停止中國之產業化，使不妨礙日本產業之發展，

易言之，即產業落後之中國與日本，應決定生產比率，使雙方生產均能存在，均能發展，舉例言之，即中國獎勵生產棉花，而日本收買中國棉花，如此辦去，則一種經濟的比率經濟分配，不僅於不知不覺中成立，即中日提攜，亦不期然而全面成立」。

由上面所引日人的言論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實是日本帝國主義政策的一部分。茲先就經濟範疇內說，其目的在造成一個日帝國主義的經濟集團。在這一集團中，則由日帝國主義獨佔一切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至於金屬權，亦要逐漸集中於日本之手。中國是以增加農產，特別是棉花鐵礦砂皮毛等原料品，以交換日本的棉織品、雜貨、機器等工業品。在這樣的一個以貿易貨物的基礎上，進而作整個經濟以至政治的合作。國際上的以貿易貨制，是要建築於彼之所有，適為此之所無，此之有餘，適為彼之所缺，相互需供之調劑上。以此原則來觀察日本所高倡的以貿易貨，實未具有客觀的條件。因為日本所需的棉花，鐵礦砂，皮毛等貨品，同時亦就是中國所缺少的貨品，這在我國每年需有

此類商品之大量的輸入，就是證明。反之，日本所需要銷售於我國的工業品，如棉織品，雜貨，同爲我國之有餘（如紡織廠因生產過剩而減工倒閉，就是證明），至少亦非大量的必需；機器雖爲我國之急需，但又爲日本之所缺；日本的機器工業，仍甚幼稚，其自身尙未脫離機器輸入的地位，安能有機器輸出。因此，中日兩國輸出入的主要商品，不僅沒有「有無相通」的可能，甚至是互相衝突的。

那末，現在高唱入雲的「以貨易貨」，豈不是一件最滑稽的事。但是日帝國主義並不是不知道此種事實，並不是不知道站在平等地位的中日「以貨易貨」之不可能；她之所以拿「以貨易貨」爲「中日經濟提攜」之基礎的，完全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一方面日帝國主義者計劃着凡是她所缺的，不管中國有餘與否都要拿去應用；凡是她所有餘的，亦不論中國需要與否都要拿來銷售。另一方面，日帝國主義更打算在「中日經濟提攜」下，進一步的把中國的政治以至經濟，完全踏在她的鐵蹄下。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獨立平等的基本條件，是要建立工業的基礎。中國過去因爲不能建立重工業的基礎，所以長期停留在被侵略的次

殖民地地位。因之，中國經濟的自由發展，特別是重工業的自由發展，就成爲民族革命運動的主要要求，同時，凡是阻礙中國經濟之自由發展的束縛，就成爲民族奮鬥之主要對象。必須是這種經濟的束縛，完全廢除，才能使破產中的國民經濟，開闢一條光明道路，才能使政治上獲得真正的解放與平等。這是中國以及世界的歷史，證明給我們的天經地義。循此原則，而往前奮鬥，則社會得以改造，民族得以復興；反此原則，而迷戀於帝國主義的懷抱中，則國家民族永淪於萬劫不復的殖民地地位。現在日本所倡的「中日經濟提攜」，恰好是促進中國淪入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爲什麼呢？我們如果照日帝國主義所希望的「提攜」下去，那末，我們的重工業，不特無從建立，即重工業的資源，亦要統統緊握在日帝國主義的手中；我們的輕工業，不特無法發展，並且因爲要不與「日本產業衝突，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停止中國之產業化，使不妨礙日本產業之發展」的結果，即連衰落的現狀，亦不能維持。至於改良農業，增加農產，以供給日本的棉花糧食之所需云云，姑無論這些農產，中國有無富餘，亦必深受工農產品之剪刀式的價格

之痛苦；並且中國產棉花，日本織棉布，再把織好了的棉布，賣給中國的老百姓，一轉手之間，就可以賺大錢，日本的如意算盤，真是打得萬無一失了，可是我國整個市場既爲日本所壟斷，全部生產，亦爲日本所控制，我們的農業，亦必更加處在長期的破產之中。這種殖民地化的經濟之發展，政治上亦自然要完全附屬於日帝國主義的直接統制之下，連形式的半獨立狀態，亦不能保持，而與朝鮮台灣一樣成爲日本的一部份！況且日本高倡「經濟提攜」的意義，並不是放棄了武力侵略手段。不過她們明顯的看到中國現在尙有可以抵抗的物質力量，特別是中國民衆的抗日精神和運動，依然顯在地或潛在地發展着，這就使日本參謀部的軍閥和政客們，萬分的感覺到害怕，並且認識到「日本今日之國力，尙不足以吞併中國四百餘州」，即使吞併了亦是「不能消化」的。所以日帝國主義者在顧慮了她自己的實力之後，就打算利用中國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以達到吞併中國四百餘州的目的，故不得不暫時的改變一下戰略，正確點說，是武力和經濟的手段，同時採用着。一隻手拿着刀槍，一隻手拿着「經濟提攜」的法寶之作用，是在，

第一，根本消滅中國民眾的抗日力量和意識；第二，由「決不收回失地」進展到「中日滿」之親密合作；第三，擴大日帝國主義的武力、政治、經濟之在全中國範圍內的活動，最後，假如由「經濟提攜」的「和平手段」，達到吞併全中國的理想，固是日本資本家的一向情願，否則，在「澈底合作」的過程中，既然廣大地增加了她在中國經濟、政治、財政和軍事各方面的力量，既然緩和與麻醉了中國人民之民族意識，所以祇要日帝國主義者認為她的實力，足以「吞併中國四百餘州」而能「消化」的時機，就可以隨時隨地發動無數的「九一八」，或者宣告中國為她的殖民地了！

這種血腥的「提攜」「親善」，本質上，形式上都未絲毫改變其侵略的意義。「九一八」誰都知道是日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一個步驟。「提攜」「親善」，亦仍是吞併中國的一個步驟。並且「九一八」是武裝的明火搶劫，現在的「提攜」「親善」，不過在武裝搶劫的行為上，塗抹了一層「和平正義」的顏色。所以「提攜」「親善」不特沒有改變日本的侵略政策，而「提攜」「親善」的本

身，就是一個慘酷的侵略政策。我們看日本的「提攜」「親善」的前提，是要中國承認東北四省的被吞併，並承認她是和平正義的勾當，永遠消滅「反日」的行為以至「反日」的思想，澈底的奴服於日帝國主義，隨日本之所欲的管理中國一切的家務，以便最後，實現吞併中國完成她的「大亞細亞主義」！這種東洋景，真有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還用得着來戳穿嗎？或者不免有人要問，日本的侵略政策，既は如此的毒辣而遠大，同時日本今日的實力，又不足以吞併中國四百餘州；為什麼中國還有一部人，硬說「抗日是死路」而積極的主張與日本「提攜」「親善」呢？關於抗日不是死路，而是唯一的生路，這在前面已講過了；現在再來把中國人為什麼也有主張，不，甚至比日本人還熱心的努力實現「中日提攜」的原因，研究一個明白。所謂中國的四萬萬人，並不是一樣的身份，一樣的思想，一樣的利害。在各個階層之間，又不免有剝削，壓迫的存在。因之利害不同，衝突日甚。其次，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所感受的利害，亦不一致。比如最大多數的勞苦大眾是最被壓迫的，最被剝削的，但是有一部分

富有的財產的人，固然亦免不了帝國主義的壓榨，可是他們能將被壓榨的擔負完全轉嫁於勞苦大眾，於他們自身是不感受損失和痛苦的；並且還有一部份買辦階級，這是在中國今日的經濟上社會上以及政治上最有勢力的一部份人，他們都是寄生於帝國主義的勢力下，從剝削勞苦大眾的過程中，分得餘潤，而發財起家的。他們早已「數典忘祖」的和帝國主義者打在一夥兒，自認爲「高等華人」而別於一般的中國人了。所以他們害怕的不是帝國主義，因爲帝國主義的勢力越發展，他們的餘潤分得也越多；他們害怕的也不是亡國，因爲在他們的新主子跟前，一樣的可以高官厚祿，面團團作富家翁；他們所害怕的乃是被剝削被奴役的勞苦大衆。如果這些奴隸們覺醒起來，不再馴服地作牛馬，那纔是根本糟糕的事情。因爲這種社會關係的衝突和教訓，使他們死心塌地的不「攘外」而要「安內」，使他們澈頭澈尾的投降外國，借着外國的勢力，消除國內的民衆力量，消滅異己份子，他們寧願東北四省丢了，寧可全中國都被帝國主義者瓜分了，也不願勞苦大衆武裝起來抗日而得到勝利；他們聽到抗日戰爭打了一次勝仗，就惶惶

不可終日，公債跌價了，金融危急了，要竭盡力量想法，使抗日戰爭歸於失敗和消滅；他們聽到抗日戰爭受了一次挫折，或者投降條約簽字了，就歡欣鼓舞，公債漲價，金融活潑，他們的地位和財產得救了！總之，這些買辦階級及其代理人，始終站在民族利害的反對方面，他們越知道民族的存亡，繫於民衆的抗日戰爭之勝敗，就越加投降於帝國主義的懷中，盡力促成不抵抗，投降，出賣或「提攜」、「親善」之急速實現。但是勞苦大眾，恰好相反，他們不知道的時候，固可「聽天由命」，任人擺佈、他們越知道民族存亡與其自身的利害關係，就會把他自身的利益與民族的利益聯合起來，而不顧一切的去奮鬥。這就是抗日和不抵抗的原因，亦就是對於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採取不同的認識和態度的原因並且亦是產生「民族英雄」與「漢奸」的社會基礎。我們常常聽到老百姓們，罵這批「高等華人」為「毫無心肝」，自然是對的；其實，「高等華人」，並不只是「毫無心肝」，實在他們已經是以帝國主義的利害為利害的「別具心肝」了！

張先生在那篇文章的結尾又說：『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先生誠然說過中日兩

國應該互相提攜的話，不過他這話當然有它的先決條件。這個先決條件便是：中日兩國須完全站在平等地位。我們今日應該特別注意這個條件之是否存在，不然，便是斷章取義，曲解遺教，便將置國家民族於重重束縛萬劫難復之地位。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把握孫先生說的「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一句話的真正意義。這裏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必須是其自身澈底放棄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同時站在反帝國主義的立場，才能說到「聯合」，才能說到「共同奮鬥」，才能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共同的解放出來，才能達到各個民族真正的自由平等之目的。日本民族自然並不排除於「聯合」之外，甚至應須說日本民族更是東亞民族聯合的一個重要份子，但是無疑的以吞併中國為目的的日本帝國主義，恰是今日最主要奮鬥對象。我們如果要真實的奉行遺教，真誠的為中國求出路，應須與日本的勞苦大眾，日本的被壓迫民族，親密的聯合起來，共同的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我們的堅決抗日，決不是如國家主義者所主張的國與國間之循環無已的報復，我們不應該以整個的日本民族為仇，反之，我們

却是主張中日兩國被壓迫的民衆，向共同的敵人——日帝國主義去奮鬥。故意的抹殺這一基本原則和先決條件，無論是代表買辦階級的主張，或是跟在日帝國主義政策下的隨聲附和，豈止是曲解遺教，簡直是與遺教根本相反。即使在忠誠的親日政策下，獲得目前的苟安，維持了私人的權位，唯一的結果，就是把中國整個的出賣了而已。況且事實上暫時的「苟安」和「偏安」，亦是絕對不能獲得的。譬如在中日提攜更加具體化的時候，日帝國主義在華北的騷擾和軍事行動，更加活潑起來，就是一個例子。所以自不抵抗主義者以至親日派，都不過是日帝國主義的萬世功臣，中華民族的萬世罪人！

最後，我們要以萬分肯定，萬分堅決的主張，中國的最後出路是在抗日，中國的唯一出路，還是在抗日。抗日誠然是一條艱難困苦的路，誠然是一條巨大犧牲的路，誠然是一條萬分危險的路，但是在深刻的明白了中國的歷史，社會，經濟，政治和國際環境以後，只有不怕艱難，不怕犧牲，不怕危險的從死中打開一條抗日的生路。這是我們爲自己，爲子孫，爲國家，爲世界的永久利益，都

不應虛偽卸責的事。爲了個人暫時的私利，而與民族與民衆的利益對立起來，不惜澈底的投降了日帝國主義，並且拿着怕艱難，怕犧牲，怕危險的卑污心理，欲麻痺民衆的奮鬥意志，鬆懈民衆的抗戰行動，這真是比袁世凱的罪惡還要嚴重萬分了！

因此，我們爲真正實行總理的遺教，爲國家民族打算，不得不向全國的民衆全國有民族意識的各階層份子，提出強烈的呼籲；爲剷除一切不抵抗與親日的禍國害民政策而奮鬥，爲中國唯一的出路——抗日而奮鬥！

## 二 抗日與軍食

抗日與親日之理論上的是非，差不多人們都能明白的。但是關聯到抗日與親日之事實上的利害問題，意見便紛歧起來。抗日的最後必然獲得國家民族的整個出路，但是必須經過艱苦巨大的犧牲，這是要在以民族利益爲利益的有遠見的人們，才肯去奮鬥；親日的最後必然要使國家民族整個的淪於滅亡，但是以個人利益爲務，得過且過的人們，就會歡迎這苟且偷安的「飲鴆止渴」。

我們必須，明白而肯定的說，抗日爲中國之唯一出路。抗日雖是一件艱難困苦的事，但牠是每個中國人的唯一責任，唯一努力奮鬥的方向。我們不應該「混吃等死」，我們不應該「認賊作父」；同時我們不能只是口裏嚷嚷，實際不去作；亦不應該利用不抗日或抗日的幌子，謀求私人的利益；我們應該爲中華民族來打算，爲民族的危亡而奮鬥，爲民族的發揚光大而努力，我們反抗一切危害中華民族的內外敵人，同時我們亦不同意狹隘的國家主義。爲要達到這種挽救民

族的目的，就應該切切實實的來計劃和準備，時時刻刻的努力奮鬥。只有這樣，才能挽救國難，才能使中國打開一條正大的生路。

抗日自然需要準備的。但是我們所主張的準備，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抗日準備，即是說相等或超過於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在情在理，都是絕對的不可能。所謂「準備好了才抗日」，不過只是一種漂亮的說法，實際上是會把「抗日」——假如主觀上會存此心的話——推延到無期實現。所以我們所主張的抗日準備，不僅是建築在現實的條件和環境的基礎之上，不僅要在抗日鬥爭過程中發展和完成，並且要在發動當前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來完成準備。這裏所說的「準備」，絲毫沒有時間的間隔，和「準備好了再抗日」，是沒有絲毫相同的。因為日帝國主義一步逼一步的滅亡中國之計劃，一天天的在實現，決不允許我們「長期準備」！中國的民衆，也決不允許我們「長期的不抵抗」！

這種準備，可以分爲精神的和物質的二種。我們再重複的說一句，這種「準備」，是與發動當前的抗日戰爭，不僅不可分離，並且要在發動抗日的前提之

下，並不抗日行動中來準備的。精神的準備中，主要的是民族意識的培養，民衆組織的鍛鍊，物質的準備中主要的是軍糧和軍器，我們在這裏即以研究軍食的準備爲範圍。

軍食的準備，應包括兩方面：（此處所說的軍食，僅就士兵而言，他如馬匹的食糧不在研究範圍內）一是糧食的充分供給問題，又一是軍食的適用問題，先來談談糧食的充分供給問題：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中，每個人的心力，都應爲抗日而奮鬥，一切的物質，都應爲抗日而使用，這是當今民衆之應有的認識和打算。在這意義上說起來，所謂軍食的供給，在抗日戰爭進行中，一切的食糧，以及最好的食糧，都應該首先供給我們的抗日戰士；而一般民衆，節衣縮食之餘，可以「吃樹皮草根」，以求戰士們的給養之充分，這又是我們民衆應有的精神。但是歸根結底的說，軍食問題，終不過是民食問題之一部分，欲求軍食真正的充分供給，自應首先求得民食的充分供給。因此我們在這裏，先來檢討我國的民食問題。

## 我國民食供給之現狀

有史以來，中國就是以農立國。近百年來，雖與外國發生了通商關係。帝國主義的工業品，大量的在中國行銷着，新式的產業，亦有不少的移植着，但是一般的說，中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農業國之一，成了帝國主義重要的原料供給地，和工業品的市場，而且這正是中國之落後，衰弱的原因。現在却不論「以農弱國」，既然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最重要部門，照理說，中國應該是一個「豐衣足食」的自足自給的國家才是。但是事實上，農業雖佔國民經濟的中心，而食糧的不足，却已成了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經常現象。據南京國民政府主計處估計，全國糧食平常年的收穫量，粳稻八七三、〇五一·七四〇擔，糯稻一〇四、二九三·七三〇擔，小麥四二三、三七四·六一〇擔，大麥一二八、二〇二·六七〇擔，高粱二三三、六六〇·四四〇擔，小米二二七、二三九·〇八〇擔，玉米一四七、七七八·二二〇擔，甘藷二六八、〇八九·九六〇擔，馬鈴薯四〇、四五四·七五〇擔，這些正雜量共計已達二十四萬萬擔，如以四萬萬五千萬人來分

配，每人可平均分配得五擔，似乎不應發生糧食不足的現象。可是歷年海關報告冊上所報告的事實却又相反。

我國輸入的糧食，最主要者爲米麥麵粉等。遠在一八三四年，米之進口額約有三五六・〇〇〇擔，一八六七年，增加到七一三・〇九〇擔，一九〇五年更增到二、二二七・九一六擔，較之一八三四年已增加七倍之多。入民國後，除八九兩年稍有減少外，其他各年均在五六百萬擔，以至二千萬擔以上，計已增加到七十倍，每年損失數千萬圓以至一萬萬八千餘萬圓。總計自一八六七年以來，共計輸入，洋米四萬萬二千五百二十萬四千零四擔，共值銀圓二十三萬萬五千九百六十五萬三千圓。自民國元年以來洋米入口值量，有如下表：

民國元年以來洋米入口值量表

數量（擔）	價値（關兩）
二、七〇〇・三九一	一一、六八〇・四六二

元年

五、四一四・八九六

一八、三八三・七一九

二年

三年

六、七七四・三六六

二一、八四三・二五三

四年

八、四七六・〇五八

二五、三三六・三二八

五年

一一、二八四・〇二三

三三、七八九・〇四五

六年

九、八三七・一八二

二九、八五四・四九三

七年

六、九八四・〇二五

二三、七七六・九三三

八年

一、八〇九・七四九

八、三〇〇・二九一

九年

一、一五一・七五二

五、四六二・二九一

十年

一〇、六二九・二四五

四一、二三〇・九九八

十一年

一九、一五六・一八二

七九、八七四・七八八

十二年

二三、四三四・九六二

九八、一九八・五九一

十三年

一三、一九八・〇五四

六三、二四八・七二一

十四年

二三、六二四・七九七

六一、〇四一・五〇五

十五年

一八、七〇〇・七九七

八九、八四四・四二三

十六年 二、〇九一・五八六

一〇七、三一三・二四四

十七年 二、六五六・二五四

六五、〇三九・一三三

十八年 一〇、八三三・八五五

五八、九八一・〇四五

十九年 一九、八九一・一〇三

三一、二三四・一九三

二十年 一〇、七四〇・八一〇

六四、三七五・八五一

二十一年 二一、三八六・四四四

一一五、三〇六・三三一

二十二年 二一、四一九・〇〇六

一五〇、七〇〇・〇〇〇(圓)

二十三年 七、七一〇・六一〇

六六、一四三・三二八(圓)

至於麥及麵粉之輸入，雖爲時較晚，但以國內新式麵粉廠之樂用洋麥，輸入量則增加甚快，如最近數年洋麥入口量，恆在一二千萬擔左右，爲值已在數千萬圓，麵粉則在三四百萬擔，以至一千一百餘萬擔，爲值亦在一三千萬圓以上。總之，近年糧食入口值，常在二三萬萬圓左右，佔到入口貨物之第一位。全國差不多有一二千萬人，要經常的依賴洋米洋麵以生活。這一事實，不僅把我們農業

國的信仰，打得粉碎，並且告訴我們民食問題，特別是戰時的民食和軍食問題上，是一個如何嚴重的現象。

### 民食不足的原因

以一個土地廣大，適於耕種的農業國家，長期大量的糧食入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可以分洋米麥的傾銷和糧產減少的兩方面說：

第一，每年數千萬擔洋米麥的輸入，並不能如實的表示了我國糧產缺少的真正數量。這是因帝國主義國家有計劃的奪取我國的糧食市場，例如美澳之麥，安南暹羅日本之米，大量的向我國傾銷，就是或因糧食生產的過剩，或因從殖民地大批輸出上等糧食的結果。另一方面，又因我國封建性的地方經濟之阻礙，如運輸的不便，運輸費的高昂，捐稅的繁重，中間商人的剝削等，以致內地糧食，不能運出，失却國內供給之平衡，更給洋米麥大量傾銷之機會。反之，因為洋米麥長期的廉價和大量的輸入，又轉使內地糧價跌落「糧產過剩。」這樣一來，更迫使農民放棄糧食的生產，改種其他農作物或竟任田地荒蕪了。

此種糧食以外的技術原料品的生產，因爲原料品本身的商品化，所以發展程度，頗爲迅速。如大豆的耕種面積，達一七六、五一八·〇〇〇畝，產量二三〇、八四〇·三六〇擔，棉花的耕種面積已達四千萬畝以上，產量達一千萬擔，花生耕種面積，爲二〇、三一六·一二三畝，產量爲二二七、三三六·一三四擔，菸草耕種面積，民八達九、三一〇·〇一〇畝，二十年仍有二、一六〇·〇〇〇畝，產量爲七萬萬磅。以上四種作物的面積，已共有二萬萬四千萬畝左右。

此外又有害人害國之鴉片煙的強迫種植，據說其面積又常在數千萬畝以至一二億畝之多。兩項合計恐怕要佔去三四萬萬畝耕地左右。假定全國農戶耕地面積爲十三萬萬畝，（主計處統計爲一，一四八、七八一·〇〇〇畝，）則此種糧食以外的農作物就要佔去百分之三十了。同時我們要知道，我國六十年來耕地面積，只增加了百分之一；而這增加的百分之一，又尙是清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十九年之期間內；民二以後，就已停止在維持原狀。一方面耕地面積不增加，另一方面，糧食的耕地面積則減少，每畝產量又無進步，這自然促進民食問題更加嚴重了。

第二，我國農地都是一種細小的集約經營，最大多數的耕種面積，都在二十畝以下，工具的簡單，動力的以人與畜為主，人造肥料的不知採用，科學知識的落後等等，較之先進的資本主義的經營，真有天上地下之別，這自然大大地影響到產量的低小。然而技術的落後，不是根本的原因，而是結果。譬如要問我國農民為什麼不懂科學知識，不知採用新式農業機器呢？這都有其客觀的原因的。自然，歷史的地理的環境，亦會影響到農民的「固步自封」，不知改進，但是歸根結底的說，還是由於農民沒有學習科學知識和採用機器的經濟條件。譬如全國農田一天一天的向地主們手裏集中，佃農一年年的增加，自耕農一年年的減少。在廣東江蘇，有些地方的佃農，竟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北方雖然百分數較低，但近年來亦是快步的起着同樣的變化。就全國各類農民的百分比數說，民國元年自耕農佔百分之四十九，佃農半佃農佔百分之五十一，二十年自耕農減少到百分之四十六，佃農半佃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四，二十二年自耕農更減少到百分之四十五，佃農半佃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計在民國二十餘年中，佃農半佃

農增加了百分之十，自耕農減少了百分之八。這種租借土地的佃農，普通要納收穫物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再加稅捐攤派的剝削，常常要花費去一個農家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外再加上種子肥料和雇工的支出，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的農民，就是永遠不放下鐮刀，就是努力於自己耕作物以外，再盡量的出賣超自然以上的勞動力，也是無飯吃的了。同時，因為政府的不去預防水旱天災，帝國主義的武力和經濟侵略，「有收沒收」都不夠上租納捐和還債，家庭手工業又被洋貨的傾銷，一一破產，所以全國百分之六十以至七十的農戶，都不得不轉側於高利貸的重壓之下。在這樣的重重剝削之下，大多數的農民們，弄得煎餅，雜合麵也沒有吃，而吃野菜，吃樹皮草根，以至吃「觀音土」，逃亡相繼的，真不知有幾千百萬人。農民們既是陷於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的境況，拿什麼去學習科學知識，拿什麼去採用新式機器？舊有的農業工具，都常常是不能保持，還說什麼改良農業經營？所以許多改良農業技術論者，都不免犯了倒果爲因的錯誤，都是同那告訴沒有飯吃的人，「何不食肉糜」，一樣滑稽和無知。

## 怎樣解決我國的民食問題

民食問題，實是國民經濟問題中的一部份。民食恐慌的形成，既是整個國民經濟恐慌發展過程中的一環，所以民食問題的解決，亦必須在整個國民經濟問題解決過程中同時獲得解決。中國國民經濟恐慌的主要原因，和其解決的前提與原則，我們認爲：第一，恐慌的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的榨取，以及依附於這兩個基本因素之上的買辦，商人，軍閥，官僚之種種超經濟的剝削。因此，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主要一環，就是在廢除帝國主義的侵略，首先在從抗日戰爭中，打倒最主要的日本帝國主義，並同時摧毀一切封建制度的殘餘。這是解決經濟恐慌和改造經濟的前題和必要條件。第二，手工業的自足自給時代，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迹，不過存在於時代落伍者的迴憶中。歷史只有前進的，經濟生活亦只有前進的，決不能開倒車。決不能將處在一切機械化的現代世界經濟一環的中國，單獨地回復到「男耕女織」「老死不相往來」的古代生活。如果有人說，中國的經濟還是停留在手工業經濟，處在不能「現代化」的苦悶中；那麼，這一

中古式的工農手工業，正是我國落入次殖民地的經濟基礎。我們今日的責任，就在剷除一切阻礙「現代化」的原因，爭取一切「現代化」必要的前提與條件，而不是恢復破壞了的落後的手工工農業。假使還有人企圖使中國經濟永遠停滯在「以農立國」或「復興手工業」，豈不就是使中國永遠保持和更深化的殖民地經濟嗎？所以我們如要——同時這亦是客觀上的要求——政治經濟上脫離次殖民地地位，就必須打下一切澈底「現代化」的方針。具體的說，就是工農業的澈底機械化，首先是重工業的大規模建設，以爲開發輕工業和農業的機械化之基礎。在這樣的方針之下，毫不留戀的，毫不惜犧牲的，剷除一切內外的障礙，才能建設一個嶄新的中國，才能趕上並站到現代世界的前頭。並且只有這樣，才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光明坦途。第三，工業對於農業，都市對於農村的榨取關係，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在中國除了這一重重的榨取以外，還有殘餘的封建剝削。理論上事實上既不能使農村脫離都市，獨立地發展，亦不能使工業附屬於農業的支配之下，所以必須，並且只有在農業機械化的方針之下，才能使農業和農村經濟

獲得澈底的改造，並取得無限發展的前途。

近幾年來，因為農村恐慌的激化，農民到處地暴動，各種救濟的方案，乘時興起。如「救濟農村」「復興農村」「鄉村建設」「國民經濟建設」等等都是。它們的言論和辦法，容或有多少不同，但是它們的出發點和主要原則，却是一致的。第一，它們都是以「復興」或「建設」農村經濟為出發點和歸結點的。姑無論中國農村就沒有「興」過，「復」到那裏去，況且現存條件下，舊的保守不住，新的創造不起，根本上就缺少改良的條件，退一萬步說，即使達到了「農業本位」「農村本位」者的最高目的，則中國仍不過是帝國主義原料的供給地，工業品的銷售場，明白的說，仍不過是殖民地經濟而已。我們真忍不住要向現時熱心改良農村運動者，提起疑問：「復興甚麼？替誰建設？」第二，因為它們都是着眼於維持現狀，所以它們的辦法，都是枝枝節節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什麼合作社，什麼改良育種，什麼改良工具，什麼建築公路等等，每一項辦法的本身，似乎都曾在別的國家收到若干效果的；似乎在農村經濟崩潰過程中，說起來

都是頗爲動聽的。但是在帝國主義與封建的重重壓榨之下的中國，事實上不特甚少成效，並且每得相反的結果。例如公路的開闢，不給地價的徵收了農民僅有的土地，還要農民負擔納糧的義務；既要農民以無償的勞役，修築公路，路成後却以保護道路的法律，禁止農民的大車小車和牛馬之通行；這樣一來，反使農民最簡單的交通工具，不能應用，而回復到更古的肩挑背負之運輸法；而汽車運費的高昂，絕對不能運出農產品，祇便利了洋貨的在窮鄉僻巷之銷售，又如提高產量的獎勵，不過替帝國主義者盡推銷肥田粉的任務。至於所謂農村合作，最有成績的，亦只限於帝國主義和工業資本家所需要的原料方面，如什麼棉花產銷合作，就是最主要的方式。第三，它們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轉移民衆奮鬥的目標，逃避當前國難的責任。「建設」誠然是一個時髦名詞，既能揩大油，又能迎合轉側於經濟恐慌漩渦中避難就易的惰性，並且最主要的逃避了當前的抗日任務，沒有前提，沒有方針，沒有目的的「建設」空談，在當前經濟政治危機中，除了反面的作用，還能有什麼有益的收穫？現時中國的廣大羣衆，正是集中一切物質和

精神，爲獲取政治經濟的生存而奮鬥。這種閒情逸致的清談和幻想，不過在緩和民衆生活的奮鬥，不過在鬆懈民族生存的奮鬥，另一方面，替帝國主義者擴大勢力，推銷商品，增加利益。並且抗日行動和意識的消沉與模糊，使侵略者的日帝國主義，與被宰割者的中華民族，在「建設」的幌子下，達到「中日提攜」的一致！所以無前提，無目的的「建設」，是與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風馬牛不相及」的。實質上是對於國難的消極，是對於抗日的取消，並且使中國更進一步的束縛於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而對中國的整個的淪亡或新的瓜分起了積極的作用。這一政治的意義，更是我們所不能不澈底的加以揭發的。

我們由於對中國經濟問題之根本的認識，認爲國民經濟之一部份的農業問題或民食問題，必須從根本的解決入手。我們不特不反對建設，並且最堅決的主張建設；不過我們認爲建設，須有必要的條件，須有正確的方針和目的。在這裏，我們只能提示一個中國農業經濟改造的原則和最低限度的綱領：

一、廢除帝國主義的束縛，實行關稅真正的自主，首先禁止農產品的傾銷。

二、廢除封建剝削，並進行土地所有權的改革，以達「耕者有其田」之目的。

三、進行工農業化的機械化，首先是重工業的建設。

四、廢除繁苛的捐稅，攤派和勞役，實行累進所得稅。

五、廢除高利貸，實行低利的長期信用放款。

六、開拓交通，減少運費，同時提高農產品的價格。

七、創辦國營農場及集團農場，採用機器，改良農業技術。

八、在政府的經常費內，確定百分之十的經費，作改良水利預防水旱災荒。

按照上面的原則和綱領，切實的實行起來，我國的農村問題和民食，軍食問題，才可以獲得根本的解決。不過還有兩點應得特別說明：第一，我國現時依靠洋米麥生活的，究是少數，並且是限於「大人先生」們居住的都市。廣大的内地是不吃洋米麥的。所以我們如果預防災荒，消除障礙，對糧食的供需和運輸，加以計劃的統制，則大多數的民食和軍食，是不至缺乏的。即有缺少，我們在抗

日的初期，可以有計劃的輸入米麥，謀得補充。其次，上述的農業經濟改造之原則和綱領，與政治問題，絕對不可分離。中國的政治問題，沒有解決以前，經濟問題是無根本辦法的。我們提出的政治經濟的綱領，決不能各個的單獨去處理，同時，也不容許曲解爲先把民食和軍食問題都辦好了，然後再來抗日，反之，民食問題與農村經濟問題和中國政治上的獨立平等問題一樣，必須在抗日鬥爭的過程中，才能漸次的得到澈底的解決。更明白的說，我國一切政治經濟的出路，就在抗日；抗日，一切問題，都有希望，都有辦法，所謂「一着活全盤皆活」；不抗日，一切問題都不能解決，一切「準備」都是空談，整個的中國，都會突變的或漸變的被瓜分與滅亡；所謂「一着死全盤皆死」。這是我們不能不鄭重說明的。

### 抗日的軍食問題

抗日的軍食之完滿解決，要在民食問題，廣義的說，即農村經濟問題之澈底解決；而農村問題之澈底解決的前題，又必須在澈底抗日戰爭的過程中，這是我

們在前面已經說得十分明白的。

作為軍食的要件有三：第一，要軍食的原料能充分供給，第二，要體積小而營養素充分，第三，要經較久的時間而不敗壞。必具此三條件，軍食問題才算解決，從另一方面說，必具此三條件的食品，才能作為軍食。

抗日並非兒戲，乃是中華民族以至人類的最莊嚴最偉大的事業。抗日亦非一時的意氣，乃是大多數民衆之長期的艱苦戰爭。我們所以堅持抗日戰爭，絲毫沒有個人的「快意」在內，而是完全爲了爭求中華民族之生路。我們所以鄭重的提出抗日軍食問題之意見，亦絲毫沒有空談，幽默的意味，而是完全爲了爭取抗日戰爭之最後勝利。因爲抗日戰爭，成了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之生死存亡的關頭，作戰期間之長久，假如沒有其他方面的變動。至少可以延長四五年以上；而這一關係整個民族之存亡的戰爭，我們應該抱着如歐洲史上的「三十年戰爭」，「百年戰爭」，之決心毅力，實爲必要。又因爲抗日戰爭，不僅時間有延長數年之久的可能（抗日戰爭時間的長短，第一決定於我國民衆是否能一致的頑強的戰

爭，第二、決定於日帝國主義國內的被壓迫者之革命運動，第三、決定於國際間對日的態度。而我國能否一致的頑強的抗戰，是有決定的作用。祇就我國民眾的決心和最壞的場合說，我們固須作四五年以至十數年之打算，不過事實上，只要我國民眾能一致的對日作戰，則這一「暴發戶」的日帝國主義，在目前國際的和其國內的情勢下，不僅不至如英法「三十年戰爭」之有持久性，甚至沒有歐戰中之德帝國主義的持久力的），同時日帝國主義亦必竭其經濟的力量，驅逐其最大的可能的人民參加戰事，以逞孤注一擲。我們知道歐戰期中，德國於全國三千三百五十萬男子中召集了兵員一千三百二十五萬人，法國於全國一千九百五十萬男子中，動員了七百九十五萬軍隊於第一線，其士兵與男子人數的比例，幾均爲一與二・五之比，就全體說，同盟國爲一比二，協約國爲一比三，換言之，她們的成年男子，幾乎完全參加到戰線上去了。這一戰爭，自然含有若干弱小民族之求獨立平等的成分在內，但就其主要意義說，完全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戰爭。在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其動員數量之大已如此，則在我國純爲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爭求

獨立的民族革命戰爭，加以種種事實和條件的限制，其要求參加戰線的羣衆數量自必更要巨大的。假如以德法兩國動員的數額爲比例，則日帝國主義最高的動員人數爲一千二百三十萬人，至於我國呢，因爲訓練和軍實的欠缺，即使打一個五折，亦可，而且必須動員四千萬人。我們可以準備爲民族獨立而犧牲二千萬人，再以二千萬的革命戰士，將日本帝國主義最後的葬埋於太平洋海底裏去。

這三四千萬人的長期抗日戰爭之給養問題，自然是最艱巨的問題之一。因爲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結構上，如上面所研討，久已爲封建的和帝國主義的剝削所束縛，而窒息了新的技術之採用，阻礙了生產力之發展，恐慌破產的襲擊，已成爲我國農村的常態。因而平時的民食供給常生不足的現象，如近年洋米的入口，要佔到米之供給量的百分之二·五，而洋麥洋麵的輸入，更佔到麥之供給量的百分之四·五，一至戰爭激烈時，這種洋米麥入口的反常現象，自然不能繼續；同時，一方面幾千萬的農業生產者，都被調上戰場，另一方面沿海沿江以及東北邊境的廣大地方，又有變爲戰區之可能，因此，抗日期中的民食和軍食問

題，比平時自然更要困難而嚴重萬分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把握農業問題必須和政治經濟問題同時解決的基本原則，換句話說，必須在澈底實行「怎樣解決我國民食問題」的幾個綱領之下，才能有計劃的改良生產，增加生產，開闢內地的荒地，簡單的說，即是統制糧食的生產和分配。這種錯綜複雜的問題，和別的國家比較起來，自然要遇到更多的困難。但是我們亦有優越的條件，如農民對於土地要求之熱烈，失業的人口之衆多，以及可墾的土地面積之廣大等，都是客觀上給與我們解決問題的可能和力量。亦就是給了糧食的生產和分配之計劃的統制，有實行與獲得成功的條件。

在這裏我們先來看一看我國糧食的耕種面積和產量的估計：

糧食名稱	耕種畝數（畝）	與總畝數 之百分比	產量（擔）	與總產量 之百分比
稻	三二三、五六六・〇〇〇	二九・六〇	八七七、三四五・四七〇	三九・八二
小麥	三四二、三七一・〇〇〇	三一・三二	四二〇、三七四・六一〇	一九・〇六

高粱 一五二、五八七·〇〇〇 一三·九六 二三三、六六〇·四四〇 一〇·六〇

小米 一五〇、一五二·〇〇〇 一三·七四 二一七、二三九·〇八〇 九·八四

玉蜀黍 九二、〇三一·〇〇〇 八·四二 一四七、七七八·二二〇 六·七〇

甘薯 二七、〇〇六·〇〇〇 二·四七 二六八、〇八九·九六〇 二三·一五

馬鈴薯 五、二八六·〇〇〇 ○·四九 四〇、四五四·七五〇 一·八三

共計 一、〇九二、九九九·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一·二四〇、九四二·五三〇 一〇〇·〇〇

就上面的估計觀看，我國糧食的耕種面積，共達十萬萬〇九千二百九十九萬九千畝，產量共有二十二萬萬四千〇九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擔。如再加上其他雜糧的面積和產量，則面積約達十二萬萬畝，產量約達二十四萬萬擔。如此數量的糧產究竟能否供給民食的需要，或糧食不足究至如何程度，這可以分成幾點說。

一方面，我國農業的自然條件，正不必以那大而無當的「地大物博」相誇，但是現有的耕地面積，尚達十三萬萬畝，已調查的荒地，共有十二萬萬畝以上；平常年的糧產量，每人平均可以分得五擔多，即使糧產中的百分之二十，係作他項用

途，每人的平均量，亦仍在四擔以上。換句話說，就自然條件看，絕不應有糧食不足之現象，且有充分發展之可能。其次，近年外糧的輸入，最多達二三千萬擔，合銀圓二三萬萬圓，這在國際收支平衡上，自佔了非常嚴重的意義。但就民食供給的觀點上看，即使此種外糧，完全爲實際所必需（事實上外糧的輸入，大部份是帶了帝國主義傾銷的性質，和商人的投機操縱等），亦沒有佔到重要地位。因爲二三千萬擔的外糧，不過只佔我國糧產額的百分之一左右，如果我國每畝糧地的產量增加二斤，或增加耕地一千五百萬畝，就可以補足外糧的輸入額了。況且事實上大量的外糧輸入，已引起國內糧價慘跌和內地的「糧食過剩」之現象呢，但是另一方面，就社會的關係說，糧產不足的恐慌，又有繼續和發展之趨勢。第一、次殖民地的中國，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恐慌的現時，更會遭受工業品和農產品雙層傾銷之痛苦。工業品的傾銷，雖有使我國農產原料，因之增加的理論，但是農產原材與工業品的交換，既要永久忍受漸次增大的剪刀式價格之損失，並且在鎖國經濟盛行的今日，農產原料的海外銷場，只有日益縮小的。至

於帝國主義者以過剩的農產品在中國市場上的傾銷，自然更使我國的手工業破產之後，再來一套急性的農業破產。其次，土地的集中，地租的繁重，苛捐雜稅和攤派的繁多，內戰的頻仍，水利的不修等等敲骨的封建榨取，一方面束縛着新的生產技術之採用，另一方面又掘毀了舊的生產基礎。譬如每次範圍廣大的水旱天災，真不知毀壞了多少作物，荒廢了多少田地，並非由於自然條件的造成，不過是政治的經濟的榨取之必然結果。因此平常年產量的估計數字，要比每年的實際收穫量差得很多的。例如察、綏、甘、寧、陝、晉、冀、魯、豫、湘、鄂、贛、皖、蘇、浙、閩、粵、雲、貴、川等二十省近四年中，小麥、大麥、秈梗稻、糯稻、高粱、玉米、小米、甘藷等主要糧產量，與平常年的比較是如下表所示：

平常年 一七五·〇八三萬擔

二十年 一五五·八四五

二十一年 一九六·七九六

二十二年 一七〇·九六五

二十三年

一三九·三九六

在上面的比較中，除了二十一年所謂「大熟年」的產量超過平常年外，其他各年產量，均在平常年之下，而其減少的差額，頗有每年遞加之勢。例如去年產量較平常年減少三萬萬五千七百萬擔，較二十一年更減少五萬萬七千萬擔以上，較二十二年亦減少三萬萬一千五百餘萬擔之多，換句話說，每年差不多有一萬萬左右的民衆在要挨餓，這是如何嚴重的現象！再次，上表中的耕地面積和產量，是包括東北四省的數字在內的。現在東北四省已爲日帝國主義者強佔去，並經不抵抗主義者聲明決不收回了，那末，東北四省對於糧食的供需關係上究竟怎樣？

四省的正雜糧栽培面積，共有一萬萬二千三百六十萬畝，產量共有二萬萬四千萬擔，各佔總面積與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可是東北四省的人口，不過只佔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所以四省不僅爲我國糧食輸出區域，並且是關內之雜糧的主要供給者。假如四省人民的糧食消費量，平均每人每年爲四百五十斤，則每年二萬萬四千萬擔糧食中，可有八千萬擔的糧食，以供輸出國外和關內之需要的。

又假如此八千萬擔糧食中，輸出國外的佔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即約六千萬擔糧食轉運關內，則已爲外糧輸入的兩三倍，而佔關內產量的百分之四了！所以東北四省的失去或收復，在民食的供給上，無疑的是佔了一個重要地位的，總上說，農業的繼續衰敗，糧產的更加減少，則又爲不可倖免的一件事。在這裏，更加使我們相信只有澈底的執行改造中國經濟的原則和辦法，在抗日戰爭中，獲取解決軍食民食以至國民經濟的前提和保證。

上面的統計，又告訴了各種糧食在生產上的地位。從耕種面積看，以小麥爲最多，計佔總畝數的百分之三一·三二，稻次之佔百分之二九·六，高粱、小米、玉蜀黍又次之，佔百分之一四至八，合計佔百分之三六·一二。就產量說，以稻米爲最多，計達百分之三九·八二，小麥次之，爲百分之一九·〇六，甘藷又次之，爲百分之二·一五，高粱、小米、玉蜀黍更次之，自百分之一〇·六至六·七，合計佔百分之二七·一四。這種產量的百分數，自然只能表示各種糧

食之生產的地位。至於在消費上的地位，還要除去糧食的他項用途和輸出之數量，還要加入輸入的數量。現引張心一先生之中國民食原料百分率的估計於下，以見我國民食中的各種糧食所佔之地位：

作物名 每作物供給食料百分數

籼梗米 二四·一五

糯米 二·九〇

小麥 二〇·七二

高粱 一七·三七

小米 一六·一六

玉米 八·六二

甘藷 三·八七

大麥 二·九七

小豆 〇·八一

馬鈴薯 ○·六二

豌豆 ○·四八

黍稷類 ○·四五

燕麥 ○·三六

蕷豆 ○·三六

蕷麥 ○·二一

山藥 ○·〇四

其他 ○·〇一

合計 一〇〇·〇〇

從上面的統計，可知我國主要的食糧原料爲稻米、小麥、高粱、小米、玉米五種，但其所佔地位，與產量所佔的頗爲不同。我們知道產量的估計，是統計處就平常年的一般的估計，而張心一先生的消費估計，大概是就某一年的糧食實收和消費的估計而製作的。在我國缺乏統計數字的今日，兩者都恐怕不足作爲絕對

的數字看，但比較其接近事實的可靠性，自以後者爲強。那末，在這兩個統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稻米產量雖佔百分之三九・八一，而在食料的供給上不過只佔百分之二四・一五，反之雜糧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簡單的說，稻麥兩種，在產量上合佔百分之五八・八八，在食料的供給上減低到百分之四七・七七，而雜糧中的高粱、小米、玉米三種却由佔百分之二七・一四，提高到百分之四二・一五。連同其他的各種雜糧共計，則我國有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人口，換言之，即有百分之五十二以上的人口，是不吃上等食糧的米麥，而以雜糧爲生的了。這種以雜糧爲生的人口之增加和衆多，其所受自然之條件的規定者甚少，而受社會經濟之限制的爲多，換句話說，即在農村經濟崩潰的過程中，迫使得多數農民不得不以廉價的食料爲食品了。關於目前大多數民衆，貧困到不能不以雜糧爲主要食品我們在下面討論到煎餅時，還須詳加討論。現在要問這種糧食原料的分配率，是否可以作抗日軍食之原料的分配率？或者選擇何種糧食作爲抗日的主要軍食？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應先考量軍食的三個要件。

軍食的第一個條件是要原料供給的豐富，這在上面已經說過，至於體積輕小和性質耐久的重要，再簡單的說明一下。體積輕小，一方面可以減少士兵的負荷力，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吃飯的時間。如果較少的分量，較少的時間，可以獲較多的營養素，這在士兵的戰鬥力和戰術上，都有重要的關係。譬如，就一個上戰線的步兵說，所負荷東西的重量計有：一桿槍，重七斤，二百粒子彈重八斤，大刀一把重二斤，毯或風衣重三斤，鐵鍊或洋鎬重五斤，以及綑帶包等共約有二十五斤左右。同時因為運輸工具的落後和不完全，運輸組織的散漫，每個士兵常須帶兩天的食糧和水，如按米飯或饅頭計，則飯包要重四斤，另加水壺及水共重二斤。因此，一個士兵須負重三十斤，而食糧重量即佔去百分之十二。並且現代的戰事，炮火激烈，戰場範圍，甚為廣大，無論如何，是不能隨地的「埋鍋造飯」，或「蒸饅頭」的，必須從後防的兵站向前線運輸。而這種兵站又常常在戰場的數十里以至數百里以外的。軍食的經過製作運輸到前線，再分配到每個士兵，至少需要三四天以至十數天的時間，至於由徵發而來的給養，其時間還要延

長些。因此，含水分多的普通食物經過長期的運輸和分配，即在寒冷的冬天，亦常變壞和沾染污穢，至在熱天的時候，只要經過二百里的輸送，已是發酵和霉爛得不能入口的了。我們並不是寬恕運輸遲緩的責任，但是普通作軍食的食品含水太多，實是值得注意的缺點，因為在炮火劇烈的前線，無論如何，是不能現做現吃的；既不能隨地「埋鍋造飯」的現做現吃，即是把食品從製好到分配的時間，縮短到二天左右（這是事實上做不到的），亦是會要發酵變味的。食品一變味敗壞就損失了營養素，以至含有病菌；既不合衛生，並且要大大地減少士兵的戰鬥力。假如以此種食品作為抗日戰士的軍食亦就是自取敗亡的一個道路了。

按照上面所說的軍食之條件，和普通食品之缺點，現將各種主要糧食所製的食品，檢討一下，看一看是否都適於軍用？我們先來看佔我國食糧四分之一的稻米。稻米的食法，最普通的都是煮或蒸成飯。這種米飯，最大的缺點，恰好是不適於軍食的水分太多，最易發酵。至於麵條，小米飯，高粱米飯，以及由高粱小米黃豆製成的餅子，以玉米為主要原料的窩窩頭等，統統都要含有百分之五十左

右的水分，與稻米飯一樣，亦是不適合軍食的。比較的說，還是由小麥麵作成的烙餅，含水較少。但是小麥的產量，不過只佔糧食產量的百分之一九，而在平時輸入的小麥和麵粉，又佔麥產的百分之四·五。如此看來，小麥產量之不能供給戰時的主要軍食，其理甚顯。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個原則的認識，我國因為各種糧食的生產和人民對食品的習慣，決不能以一種糧食作為唯一的軍食，可以同時採用幾種，不過須以最適軍用的一種，作為主要的食品。其次，適合體積輕小和有耐久性之條件的，唯乾糧為最適宜。

或者有些吃過洋麵包的先生們，要說這個「乾糧」問題，外國人早已很好的解決了，我國軍隊裏，也會採用過了，就是餅乾。養分多，體積小，又衛生，又香脆。我們現在只要大量的生產或購買餅乾就行了，還用得着再來嘮嘮叨叨的研究論麼？

這種說法，驟看起來，似乎很對。但是實際上絕對行不通。這種辦法，我曾

經詳細的思想過，計劃過，並且實驗過，得的結論是辦不到。這是什麼道理呢？且聽我說：第一，我國人民的食品習慣，有的吃麵食，有的吃米食；餅乾的香甜雖甚可口，但決不便作爲全國軍隊的口糧，並且我國麥的產量，也不能供給這個廣大的需要。第二，餅乾的價格甚貴，而我國士兵的伙食，每月平均不過三圓，這在經濟上是無力負擔的。第三，餅乾的生產，須是集中的大規模機器生產。可是我國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可以供給一二十萬人的餅乾工廠。抗日戰爭的初期，就要有士兵一百萬人，兩三月後，更會增加至六七百萬人。我國現在所有的食品公司，規模都很小，不過只是作些「點心」的餅乾，並且這些公司，都是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大埠「租界地」的上海和天津。這些地方，在平時就要受外國勢力的統治，一入戰期，更不用說，要變成日帝國主義的軍事堡壘，或變成封鎖地帶，即使能製造多量的餅乾，不能運輸出來，也是沒有用的。如果抗日軍士的給養，要依靠這種沒有保障的供給，那末，不用艱苦的攻戰，就會一個個餓的「兩腳筆直」了！至於說從外國大量的購買，姑無論這種大批的金錢，我國能不能擔負，

經濟不經濟，即是軍隊的給養要依靠外國的經常供給，就是必敗之道，何況戰爭一激烈，外來的糧食，就不能輸入呢？

我的意見，並不是是否認餅乾不可以作為乾糧，我只是反對那種「大老倌」的不負責的空談。我們可以想像到抗日戰爭發動了以後，參加戰線的士兵，必然是有幾百萬以至幾千萬人。這個幾千百萬人的軍食，雖然有一部份的時間可以由各軍營自己製造飯食，但在激烈的前線，必須依靠後防的乾糧之供給。這種乾糧，依照我國農產的情形，人民飲食的習慣，米麥及其他種糧食，均可作成乾糧。同時，亦應該積極的提倡人民製作和吃食乾糧的習慣。譬如我國人民，平時對飯食的習慣，都是喜歡吃稀的，而不喜歡吃乾的，都是喜歡吃熱的，而不喜歡吃冷的。這恰好和戰爭時所能得到的食品相反。其實乾的與冷的，既更合於衛生，同時亦為戰爭的勝利上所必要的。這是我們必須在一切軍事學校，民團，學生軍以至一般人民中，平時就要訓練成吃食乾冷的食品之習慣。至於麵食的餅乾之供給，一方面由國家在麥產中心的內地，設立大規模的製造餅乾的工廠，一方面獎

勵通商大埠的食品公司遷至內地去，同時限制麵粉公司食品公司集中在租界地的趨向。這些事情，必須按照供給二三百萬人之麵食的計劃，切切實實的，馬上實行起來。譬如山西從前製造的「晉軍餅乾」，就是一個可以效法的例子。北方人有時吃的炒麵，亦可以設法改良，作成小塊，便作軍用。總之，我們須依照我國生產狀況，生活程度，和生產能力，以適合軍用爲前提，可以研究各種樣式的製造乾糧法，不必純粹模仿西洋，亦不限於晉軍大餅乾的樣式（晉軍餅乾的缺點，就是太堅硬），以實際適合於軍用爲目的。

至於米食呢，我們亦要講究製造乾糧的方法。譬如江南的地方，許多人家製造一種叫做「炒米」的乾糧，一般的叫做「炒鍋巴」。這種「炒鍋巴」的發明，大概由於「廢物利用」的緣故。江南人家都是吃煮飯的。飯煮熟後，鍋底總要結一層鍋巴。人口少和用茅草燒飯的，鍋巴結的較薄，在飯吃完了以後，再燒火將牠烤乾，就成一片片的脆鍋巴，可作爲點心時的乾糧。不過這種脆鍋巴的產量，是很少的。至於人口多的人家和店舖作坊等，每次煮飯剩下的鍋巴，又厚又多，

烤也不易烤脆，乾脆了也不易咬的動。於是，人家就把這種厚鍋巴，放在太陽裏晒乾，用杵臼舂成小粒子；稍加一點香油在內，再放在鍋裏一炒，每個粒子脹發起來，較原粒要大到三分之一左右，而成為帶黃色的香脆的「炒鍋巴」。「炒鍋巴」吃的時候非常便利，用開水或茶泡一下，或者就是乾的吃，都無不可。而吃時亦可不要菜蔬，因為炒鍋巴本身的香脆，就能開人口胃的。並且「炒鍋巴」很能充飢，平常人須吃三碗飯的，而炒鍋巴却吃不下兩碗。這自然對於作工的行路的人，都非常便利。大概就因為這種優越的條件，和人們對於乾糧的需要，由煮飯而剩下來的鍋巴，老是供不應求。於是許多人家，就直接將米煮成飯，晒乾舂成細粒，炒成鍋巴。這種「炒鍋巴」就成為江南通行的乾糧了。

這種「炒鍋巴」在太平天國的戰亂中，是起過很大的作用的。那時皖南一帶是太平軍和清軍的攻守之地，老百姓們弄得不敢在村莊居住，相率逃避於深山大谷。藉以生活的不能不靠乾糧。「炒鍋巴」雖甚輕便耐久，但是因為米粒脹大了的緣故，其體積亦因之增大，這在逃難的人們。不免覺着是一種累贅。因應了

這種需要，在皖南一帶就發明了「炒鍋巴粉」。「炒鍋巴粉」的製造，是將「炒鍋巴」內加上十分之一二炒熟了的芝麻，合磨爲細末。這樣，不僅減小了體積，並因加了芝麻，養分亦增加了，所以最能充飢，普通是四五羹匙或一小碗，就可以吃飽，而且能支持較長的時間。此外還有一種由「炒鍋巴粉」進步來的「藥糕」，其製造法似乎更可令我們注意。「藥糕」之原料，主要的爲「鍋巴粉」，另外加上各種藥料和糖，而製成的形樣與餅乾差不多。這是因應小孩身體虛弱或患了慢性疾病而發明的。小孩的慣性，是不喜吃藥的，現在把藥料加在藥糕內，就可於糕點的消閒中收到醫藥之效果。由於這種「藥糕」，很可以啟發我們由米食製造乾糧的方法。同時這種「炒鍋巴」「炒鍋巴粉」以及「藥糕」，比較日本士兵用的「炒米」，亦自然精良適用的多了。

明朝戚繼光將軍在浙閩一帶，剿除倭寇，這是明代的抗日戰爭他曾爲軍食的困難，而發明了一種「光餅」。（這種餅，因爲戚繼光剿除倭寇而發明的，人民爲紀念他，故叫做光餅，）這是由麵粉製成中有小孔的乾餅。「戚家軍」每在攻

擊倭寇的時候，把許多「光餅」穿在一條繩子上，從兩個肩膀上穿過來，像數珠似的掛在胸前，隨手摘來用以充飢。這種把「光餅」穿起來掛在胸前的方法，我們現在看起來，不免覺得太笨拙，但是這種「光餅」與「戚家軍」戰勝倭寇，是有很大的關係的。並且一直到現在閩浙一帶的人民，爲紀念「戚家軍」「抗日」的功勞，還保留了「光餅」這種食品。這又是抗日軍隊所當効法，並又可藉以改良軍食的一個模範。

上面對於米麥在軍食中的重要地位，怎樣製造乾糧的方法，已就我們研究所得，儘量介紹了出來，希望更能引起國人之良好的研究和設計。

### 三 煎餅與軍食

在這裏我要詳細的介紹另一種可以作爲主要軍食的「煎餅」。

#### 煎餅之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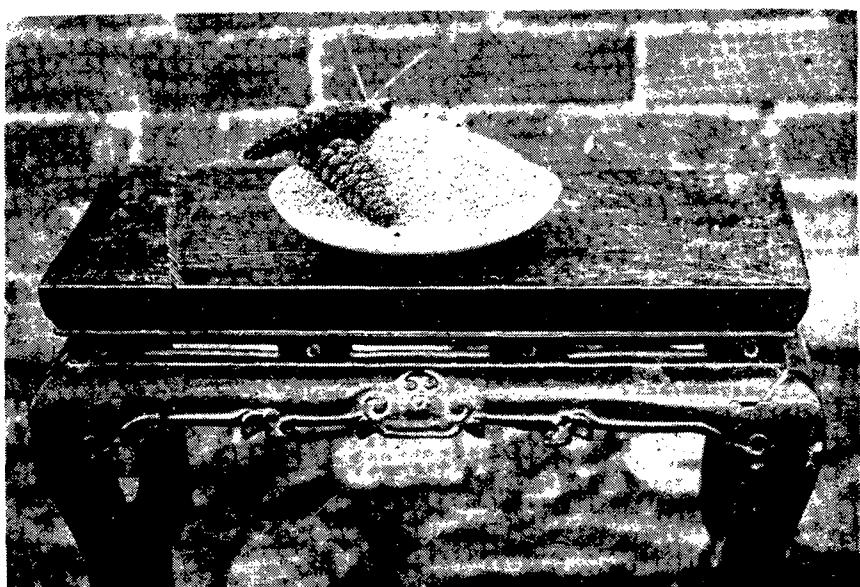
「南人食米，北人食麵」，是我國人民之食物的兩大區別。其實所謂「北人食麵」者，實只限於某些地方和某些人民，並不能概括全北方的人民。如河北、山東、河南及東三省等地最大多數農民的食物，不是小麥製造之麵食，而是「雜糧」。小麥雖是北方糧產之大宗，可是總因麥的生產費較高，和銷路的比較吃香，都把麵食看成上等食糧，大多數的老百姓們都是吃不起的。只有年節喜喪大事，和麥秋的短時間內，才可吃幾頓麵食；而長年與麵食絕了緣的人家亦不在少數。上面關於食料原料的統計說，我國人民有一半多是以下等糧食的雜糧爲生，恐怕尙是一個最保守的估計，實際上還要多的多呢！俗語說：「木匠住草屋，瓦

匠住倒屋，」現在辛辛苦苦種小麥的農夫，又不得不長年吃「雜糧」。這自然是木匠願意住草屋，瓦匠願意住倒屋，而農民願意吃雜糧的，實際上是受了種種的壓制不得不然的。洋房大屋，都是工人所建造，麵粉白米，都是農夫所生產，可是社會人吃人的制度，却使生產者無權享用。就以種麥種稻的農夫說，所收穫的麥稻，或者要拿去告了租，或者要拿去賣了來還債納稅，或者要去換些油鹽布疋。這些上等糧食，既然為特殊地位的富人所需要，同時每擔的價格，亦是比較高點，譬如小麥和稻子，都可以賣到五圓以上，而雜糧却只有三圓幾角一擔的。因此農夫們就不得不賣了最好的麥子，自己來吃次等的雜糧。況且事實更告訴我們現在雜糧亦不能夠為最貧苦的農民所享用了！為了還債納租賣了麥子，又賣了雜糧，甚至要賣了兒女老婆。他們只有吃野菜草根，來維持牛馬的生活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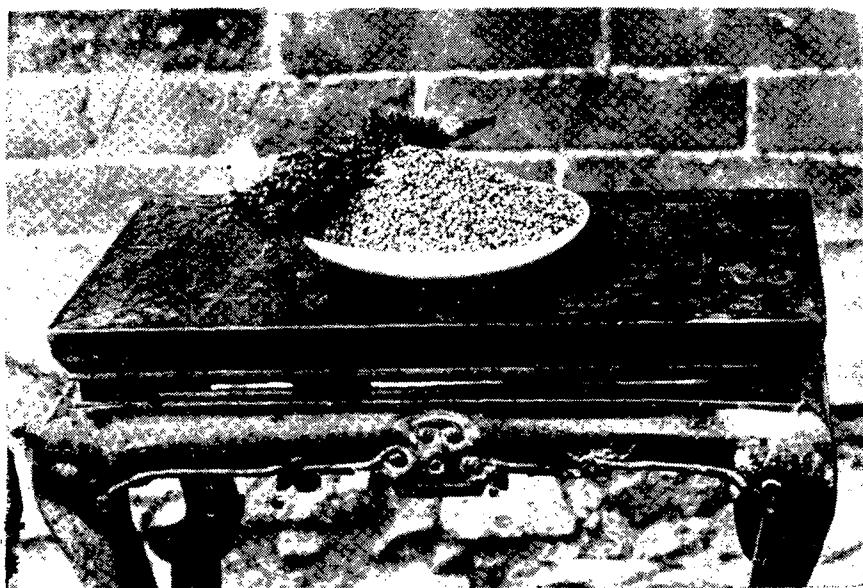
這一切都是現在「富欺貧，強凌弱，男壓女」的世界。亦就是最不平等，最不公平的怪現象。所以要求民族的平等和社會的平等，却是抗日戰爭不可分的任務了。



玉蜀黍，又俗稱棒子，播種期有早晚期之分。早期在寒節後，晚期在清明節後，約在四月廿日左右。



穀子，用石碾去皮後，即成小米。播種期在穀雨節之後，約為陰曆三月廿日左右。



。出產大宗華北，在寒食節之後，爲播種期，高粱

却說什麼叫做「雜糧」？雜糧這一名詞，自然是從與正糧比較而發生的。北方人稱小麥爲正糧，小米（粟）高粱（稷）玉米（玉蜀黍俗亦稱棒子）等爲雜糧，這種雜糧，都爲春夏季作物，頗能耐旱，所需肥料人工又較少，而產量每較多。通常的吃法，可分爲小米飯，小米粥，高粱米飯，高粱米粥，高粱餅子，玉米糊和窩窩頭（由玉米粉——雜合麵製成的一種蒸食）。此外，將此種雜糧加上黃豆，合磨成糊子，攤成一張張的薄餅，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煎餅」了。

煎餅的樣式，普通是每張直徑一尺五六寸左右的薄圓餅，其厚薄的程度，全憑原料的差異和手藝的高下，最薄者不過一張厚報紙的樣子，最厚者亦不過和兩張報紙相等。煎餅是一種很好的乾糧，剛作好的煎餅所含水分。頂多不過百分之二十以上，少則百分之十以下，到了發脆的程度。而且煎餅在作好了以後，所含的水分，尙可以因自然的蒸發作用，逐漸消失。所以在人口衆多的人家，每天現攤現吃，在人口少的人家，或有特別需要，常常一次就要攤好足夠一月半月的煎

餅。並且作工者，旅行者以至在外求學的貧苦學生，都是攜煎餅作乾糧。有些出外作工者和學生，往往從家裏帶出了足夠一二月吃的煎餅，一張張的吃下去，直到吃到最末了一張，尚可以不致霉爛。不過這只限於冬天秋天和春天，夏天因為天氣的特別關係，保藏的時間，就要縮短到二二十天了。

製造煎餅的原料，小米、高粱、玉米和黃豆等，雖然普遍地生產於北方各省，但是以煎餅爲日常食品的現象，並不普遍。河北河南及東三省亦間有吃煎餅的，但是他們的吃煎餅，直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如某種節日或秋收的時候。以煎餅爲日常食物的只有山東省的舊泰安府屬及青州府的一部分泰安、長清、肥城、東平、陰平、東阿、汶上、寧陽、泗水、曲阜、新泰、萊蕪等縣，都是一年到頭的以煎餅爲食物；膠濟路沿線的安邱、濰縣、益都、壽光等縣，則在秋春兩季以煎餅爲主要食物。計算這些地方食煎餅的人口，約在四五百萬人以上。

北方某幾省的大多數人民，既然都以雜糧爲主要食品，而煎餅的優點，如貯藏甚久，半脆性中含有香味，以及食時之便利，可不需要甚麼菜蔬，一點鹹菜或

者「白水泡煎餅」，亦可飽餐一頓等等，亦爲北方人民所熟知。特別是泰山爲山東全省及河北南部，河南東部，江蘇北部的人民拜神之「福地」，每年春季廟期，成千成萬的人，不遠數百里而來燒香還愿，似乎更有傳播之機會。但是事實上，爲什麼只有泰安府附近人民才有吃煎餅之習慣？據我們的觀察和研究，可以分自然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諸原因。

就自然的原因說，高粱、小米、玉米和黃豆等原料，以及用作燃料的茅草，穀梗，麥桿，豆葉及秫稈等，這些自然條件，北方大致相同。但就製造煎餅的工具說，那就各處不一樣。譬如重要的工具之一的石磨，是把原料磨成半液體的唯一工具。此種製造石磨的「麻石」，並不各處都有。北方的平原中，往往找一個小石子都不易，更何論製磨的巨石。其次，製買一切工具至少要十數圓的費用，亦非中小農家所能勝任。這大概就是煎餅不能普遍的原因。但是話又須說回來，泰安農家，亦是大都貧苦而非富裕到足以製買一切工具的，同時泰安的花岡石，固可製磨，但因粗脆亦非最適合者。據調查泰安的石磨有不少是爲章邱石所製，

這是要從一二百里以外運來的。那末，舊泰安府人之以煎餅爲食品的原因，恐怕主要的不能不是政治的因素了。按泰安府和青州府一帶，都是春秋戰國時齊魯之地，各國間的爭城奪地的戰爭，最爲頻繁。那時的「農即是兵」，所以老百姓們都陷於戰時狀態；同時，那時的軍隊給養，全要靠徵發而來，甚至兵士們還要自己從家中攜帶乾糧的。所以煎餅或許是這時候的一種偶然的發明，可是因爲煎餅對於軍食之便利的緣故，就由政府之提倡和強迫而普遍起來了。因爲政治權力的作用，才可以克服了自然的和經濟的困難。後來雖然戰爭停止，而民間因爲既有工具，並且已養成吃煎餅的習慣，所以煎餅這一種食品，就不知不覺的保留有二千年的歷史了。

### 煎餅糧食之生產

「煎餅糧食」的高粱、玉米、小米和黃豆的生產情形，據國府主計處之平常年收穫量的估計是：（面積單位千畝，產量單位千斤）

煎餅與軍食

省 別 數量	種類			高粱			玉米(玉蜀黍)			小米(粟)			大			豆			合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面積	產量
江蘇	六、七萬	九、三〇〇	三、九六	五〇〇九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江 蘇	六、七萬	九、三〇〇	三、九六	五〇〇九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安徽	五〇三	六六、九七	五〇	八七、六四	四六	五九、一〇八	八八、四三	一八、八五	八八、四三	一四、八五、六〇	安 徽	五〇三	六六、九七	五〇	八七、六四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河南	一五、四九	一九、六三二	八、六三	九六、〇五	一九、三〇	三九、一六六	一四、九三	一四、七七、二〇一	一四、九三	一四、九三	河 南	一五、四九	一九、六三二	八、六三	九六、〇五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湖北	三、六五九	KOO、五九	六、五八	一、零六七、一七	二、二七〇	四九〇、六四	五、二八〇	七六、〇三一	七六、〇三一	一七、七四	湖 北	三、六五九	KOO、五九	六、五八	一、零六七、一七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四川	五、四四	八六、九三	三、五二	三、三九、四〇	一、一七〇	一九〇、六四	二、二七〇	七、五九	九六、九二	一六、八六	四 川	五、四四	八六、九三	三、五二	三、三九、四〇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雲南	七六	七、五〇九	三、六六	五三、五七	一、一七〇	一九〇、七一	一、一七〇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一七、七四	雲 南	七六	七、五〇九	三、六六	五三、五七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貴州	六三	六六、八六	三、一六	五九、三三	一、一七〇	一九〇、七一	一、一七〇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一七、七四	貴 州	六三	六六、八六	三、一六	五九、三三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湖南	一、五五	三、五五	一、九〇	三、一九、七三	八三	一五〇、〇三〇	一、一七〇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一七、七四	湖 南	一、五五	三、五五	一、九〇	三、一九、七三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江西	一四	五、九五	八〇	一一、七五	七〇	一一、七五	一一、七五	一、一七〇	一、一七〇	一、一七〇	江 西	一四	五、九五	八〇	一一、七五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浙江	一三一	一七、三五	一、一〇九	一九、九八	五五	一一、七五	一一、七五	一、一七〇	一、一七〇	一、一七〇	浙 江	一三一	一七、三五	一、一〇九	一九、九八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福建	一五	二、〇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福 建	一五	二、〇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廣東	一六	四、四九	一四	一四、九五	七五	三九、五四	一、一七〇	一、一七〇	一、一七〇	一、一七〇	廣 東	一六	四、四九	一四	一四、九五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廣西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廣 西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山東	三、三九	三、四〇、一〇九	五、九三	六三、八三	三一、七五	三、七九、一九	元、九〇	三、九三、六三	九、二八	三、六七、一七三	山 東	三、三九	三、四〇、一〇九	五、九三	六三、八三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河北	三、六九	二、五五、九六	二、五〇一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河 北	三、六九	二、五五、九六	二、五〇一	二、〇九、一九七	二、五〇一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二、〇九、一九七
山西	九、八四	一、三三、一〇九	四、〇五	KOO、五九	一八、四九	二、一〇九、一四〇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三、二七一	山 西	九、八四	一、三三、一〇九	四、〇五	KOO、五九	一、五五	三九〇一七	一九、四〇一	二二、九五	三一、五六九	四、〇六七、六三〇	

陝 西	一、九三	三、九一	三、七三	四、九一	四、五、二九	二、一〇三	三、六、五三	三、九〇	一、六、五〇
甘 蘭	一、七三	三、四、〇九	一、六七	一、九、〇一〇	三、三四	四、六、〇九	一、二四	一、九、一九	七、六六
新 疆	七七	一、九、三六	二、六八	五、二、六九	三、四	四、五、四八	一九	一、九、九六	三、八六
青 海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八、六、五
寧 夏	一〇九	三、六、六三	七	三、二六四	三、三	五、六五	戈	三、九七	四、二〇
綏 遠	一、九七	三、四、五六	五	二、四四	四、一〇九	五、六、七三	一、〇三	一〇九、三六七	七、一八二
察 哈 爾	一、六三	三、九、五三	四 八	八、九、五六	三、三五	四、三、三四	缺	缺	五、四〇
熱 河	三、三一	五、六、六三	三三	三、四、〇一五	七、一五〇	九、七、八二	一、九三	一、七、九三	四、六五
遼 寧	三、四、三四	四、六九、五五	九、一〇六	一、九四、八三	十、四四	一、七、四、四六	一、五、八〇四	三、九七、九三	九、一〇
吉 林	三、三七	三、六、一九	三、五九	七、一、七六	二、九七	一、九九、八三	三、七一	五、五二、九四	五、六七
黑 龍 江	八、三三	一、三、五、九一	三、六三	四、三、八〇	一〇、一五三	一、六、五、六九	一、九、一〇一	二、九、一七九	六、一三、三五
總 計	一、五、九七	三、三、六九、〇九	三、〇九	一、四、七老、八三	一、五、一三	三、七三、六六	一、七、五九	三、三〇九、一〇九	五、一、三九、一八〇

照上面的統計計算起來，全國種植高粱的面積共有一五一、五八七千畝，產量二三、三六六、〇四四千斤；玉米的面積九二、〇三一千畝，產量一四、七七七、八二三千斤；小米的面積一五〇、一五千畝，產量二一、七二三、九〇八千斤；大豆的面積一七六、五一八千畝，產量二三、〇八四、〇三六千斤；四

項合計共有面積五七一、二九八千畝，佔全國主要糧作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產量共計八二、九五一、八一〇千斤，佔全國重要糧產百分之三十四。

這些農作物，比較的富於耐旱性，每畝平均產量亦較小麥為高，如小麥每畝平均產量為一二四斤，而高粱則為一八四斤，小米一七五斤，玉米一六一斤，大豆一七〇斤。同時，對於施肥加工等，亦較米麥為省減。所以這些農作物，種植最多的是雨量較少的區域。在上表中，亦已告訴我們這一現象。就面積言，山東省的七千九百餘萬畝為最多，其次，河北的七千一百三十萬畝，遼寧的五千九百七十萬畝，河南的五千七百六十萬畝，吉林的五千萬畝；寧夏的四十四萬畝為最少。就產量言，以山東的一百一十六萬萬斤為首，遼寧的一百〇七萬萬斤次之，河北的九十萬萬斤，吉林的八十七萬萬斤，河南的六十七萬萬斤又次之，亦以寧夏的九千七百萬斤為最少，雨量充足的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面積產量都不佔重要地位。這些作物的分佈，雖不平均，但甚普遍，在二十餘省中，雖有產量多少之區別，但無一省沒有此種作物的。足見全國的土壤，氣候，大體上都適宜於此。

種作物的栽培。我們決不是主張全國人民都要改以雜糧或煎餅爲食物；雖然，事實上無論產米或產麥的地方，多數的貧苦人民，都是以雜糧爲主要的食糧或作一部份食糧的。我們在這裏，只提示一個意見，如果採取煎餅爲軍食的話，對於煎餅之原料供給的自然條件，比較是良好的，只要我們有計劃，和加以獎勵，則這些作物的產量，不難有數倍之增加。最後，我們嚴重的提出，並且要警覺全國民衆的，即是東北四省在糧食生產上的地位，以及她所給我國的損失：

東北四省之糧食生產在全國的地位（畝數單位千畝，產量單位千斤）

	栽培畝數 佔全國栽培畝數之百分	產量 佔全國產量之百分
稻	四、三五五	一、三
小麥	二二、五三九	一、一〇〇、三三八
高粱	五一、一一〇	三三、五
小米	三九、八四二	九、一九一、〇七九
	二六、五	六、三一六、五八七
	二九、一	三九、三
玉米	一五、七六九	三、〇〇四、〇四六
	一七、一	二〇、三

大豆

五四、七三〇

三一、一

八、五四九、三九八

三七、一

合計

一八八、八〇七

一五、一

三一、五六一、五〇九

一四、五

從上面看來，東北四省之糧食的栽培面積，要佔全國的百分之十五，產量佔全國的百分之一四・五，特別是高粱、小米、玉米和大豆的地位，更加重要其栽培面積已佔到全國的四分之一，而產量更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以東北四省的地廣人稀，這種豐富的農產，可以移植關內過多的人口，可以爲對外貿易之出口的大宗，並且可以供給關內人民之缺糧的需要。「九一八」以前，所謂「關外紅糧」，常供給北方諸省之糧食的需要。由此可見，東北四省的被侵奪，僅就農產一項說，已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同時，亦可見抗日和收復失地，真是不可須臾再遲緩的。如果還有人主張不抗日，不收復失地，豈不是「賣敵人以糧」的漢奸嗎？

## 煎餅之製造

在具體的介紹煎餅的製造以前，先來說一說製造煎餅的器具。製造煎餅的器具，實甚簡單，主要的只是一盤磨和一副鑊子，此外不過是缸盆和鐵勺等附屬器具而已。

磨是「麻石」作的。磨的大小，普通是直徑一尺五六寸至二尺，厚三四寸至六寸，上面的一片，鑿通一個圓洞，以便「煎餅糧食」由此漏下。磨的架子，有的是木製的（亦有以石製的），在磨架下放入一個較磨徑稍大的一個木盆或瓦盆，以承受磨出的半液體——「煎餅糊子」，這與南方磨豆腐的磨，完全一個樣子，不過稍有大小之區別罷了。另一種磨架子，是用比磨徑大到一倍的巨石，作成石盤，將磨放在石盤的中心，石盤的下面，即用小石墊砌起來，使其高度適合於人或牲畜的推挽。在沿着石磨的周圍，將石盤鑿成半寸深的一條槽，在槽的一面，開一個口，緊接的放一個桶或瓦缸，以承接「糊子」的流出。磨之上面一片

的兩邊，各鑿一洞，榦上一根六七寸長的木桿，作爲磨的兩耳。在要磨糧食的時候，就此兩耳繫上繩子，套上一根或二根長約五六尺的木棍，由二人或一人推動木棍，隨着人的前進圈轉，磨亦轉動不已。在經濟充裕而畜有牲口的人家，則完全由牲口挽磨了。一副磨的價格，約自六圓至八圓，再加入磨架等的費用，恐怕要在十圓左右。據調查一副磨的生產量（牲口挽磨的）如以十點鐘計，則可磨糧食五六百斤，因此，在貧窮的人家，並不需要每家都要製備一副磨，有些村莊中，四五家至七八家共使一磨的亦爲常有現象；不過經濟狀況較好的自耕農，或佃農，普通都要製備一副磨，而爲家產的一個重要部份。

鏊子是用生鐵鑄成的。牠的形式，恰像一面裝上三隻腳的大鑊。牠的直徑普通在一尺六寸至一尺八寸，據說也有較小的，不過較少像天津北平，每天早晚賣「煎餅棵子」的，所用鏊子，直徑就不過一尺以下。鏊子有三隻腳，都很低，不過二寸左右，放在平地上，生起火來，可以充分感受火力。不過鏊子放在地上，並不要成平面的，而是傾斜形的，靠近攤煎餅者的一面，約要低下五六分，以便

使用推子攤勻糊子時，易於使力。鏊子的價格，普通在兩圓上下。

其他必要的器具，是一口或兩口瓦缸，作浸糧食之用，一個瓦盆，以爲盛糊子之用；另外一個鐵勺子，一個木推子。這些用具，除木推子外，都是習見的東西，用不着解釋。至於這個木推子，亦是甚簡單的，不過長約六七寸的兩條小木，連接成一種丁字形的器具，豎的一條細木是一個把，由攤煎餅者握在手中，而使用橫木片（或竹子作的）的下面，將由鐵勺內傾倒在鏊子上的糊子，適當的使力攤薄和均勻起來。

至於使用的燃料，我們在前面已說過，是使用茅草、樹葉、麥桿、粟桿、稈葉、豆葉等。這些燃料須有易於燃燒，熱力不太強的特性，才便於煎餅的烤乾水分，結成薄餅。火力太烈或太小，都是不適於攤煎餅的，因爲火力太小，則使糊子不易凝結成薄餅，而太烈則又會燒焦的。

我們在前面，雖已說過煎餅的原料，是高粱、玉米、小米和黃豆四種，但每一煎餅中並不包含四種糧食在內，其配合的分量，亦不一致，有時可以多到五

種糧食（如加小麥），有時又可以少到一種（如棒子的或高粱的），現將幾種最通行的配合方式，介紹如下：

甲、高粱棒子各半的配合，譬如高粱十斤，棒子十斤；

乙、高粱十五斤，棒子五斤，小米十斤；或高粱十五斤，棒子十斤，小米五斤；

丙、高粱十斤，小米十斤，黃豆二斤；

丁、小米十斤，黃豆二斤，棒子二斤，或者小米棒子各五斤，黃豆二斤；

戊、小米十斤，黃豆二斤。

上面的五種配合，可說是最基本的配合方式。這裏我們要說明兩點：第一，各種糧食配合量的多少，是依據一種經驗的化學知識，不能隨意改動和增減的。如我們看上面各式的配合量，無論怎樣變動，棒子或黃豆則爲不可少之要素。我們知道黃豆是最富蛋白質和脂肪的植物，同時黃豆還有和棒子一樣的特質，就是能使煎餅鬆脆起來。同時，煎餅中加入黃豆，固然使養分增加，味道變好，但是

大概須保持一與五之比例；如果黃豆加的太多的話，那會使煎餅太薄而不易攤成整個的餅。第二，上面五種方式的排列，是反映農家各種經濟狀況的。貧苦的農家，吃的煎餅，只能是高粱和棒子的混合，自然最貧苦的還只能吃單純的棒子或高粱的；經濟狀況較好的，才可以加入小米和黃豆，至於小米和黃豆相配的成式，那是煎餅中之最質良味美者。能以此爲經常食物者，自非最富裕的人家不能。此外，還有有時加入三五斤小麥者，這自然更非一般的現象了。大多數的人民，不吃小米黃豆的煎餅，而吃高粱棒子的煎餅者，這亦與老百姓不能吃麵食一樣，是因爲經濟條件所限制。譬如一百市斤的小麥，現在的市價，要賣到五圓以上，小米可賣到四圓二三，黃豆亦可賣到四圓，但棒子只賣三圓七八，高粱只賣三圓五六。這種市價的高低，不就是很好的說明了老百姓的所以不能不吃高粱棒子的煎餅之現象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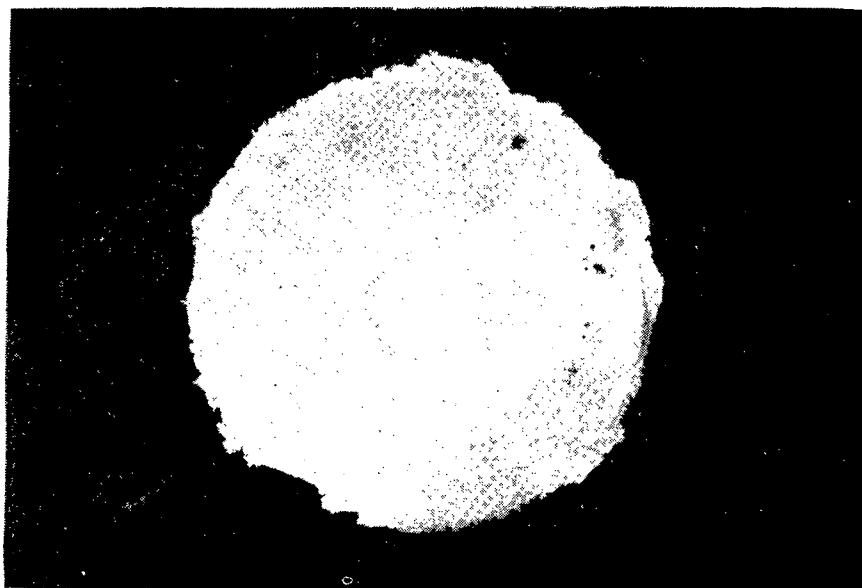
現在再來說明煎餅製造的手續。將已配合好的糧食（如果有棒子須先將棒子在碾內碾成碎粒），浸在瓦缸內，約經十七八點鐘，糧食已浸透，經過一次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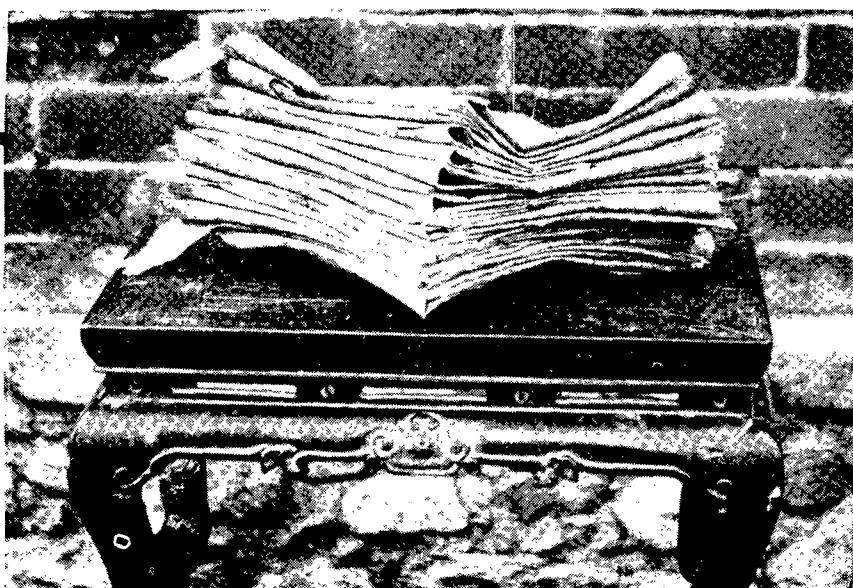
。況狀之時糊餅煎磨民農爲圖



。況狀之時餅煎攤婦老爲圖



。狀形餅煎之熟攤已爲圖



。狀形餅煎之好疊攤已爲圖

洗，將沙土雜物，淘干淨，然後和以三分之二左右的水，一瓢瓢的傾入磨中，細磨成半液體的糊子。普通人家，每次磨的煎餅糧食，總有數十斤，磨成的糊子，可以貯藏缸中。到了攤煎餅的時候，再取在應用的瓦盆中。糊子的貯藏日久，每易發酵，略帶酸味，如泰安人就有喜食此有酸味的。攤煎餅者坐在一矮櫈上，把鏊子放在面前，將草本的燃料，一小把一小把的燒着，燒到鏊子的熱度足夠，就在鏊子上用佔染了豆油的油烙拂拭一下，然後用鐵勺舀一勺糊子，傾倒在鏊子上。一方面即用推子將糊子均勻到鏊子的全面，另一方面加大了火力。輕快有力的攤開沒有凝結，或凝結而不均勻的糊子，直推至成功了一張圓而薄的煎餅，同時糊子的水分，使其盡量的蒸發完了，就將鏊子上已乾脆的煎餅，撕揭下來，放在一處。再一張一張的繼續攤下去，或直把糊子攤完，或攤夠所需要的數量即暫停止，或因事時作時停，亦無甚不便。攤完後，再將攤成薄圓片的煎餅。——差不多有直徑一尺六寸左右的煎餅，重量不過二兩上下，折疊成長方形，完成煎餅的最後一次手續。一個人管理一個鏊子，是最普遍的現象，攤的煎餅亦最

薄最好，一個熟練的工人，每點鐘能攤五十張左右，最多亦不過六十張。此外，還有一人管理兩個或三個鏊子的，每點鐘可以攤一百張至一百以上。不過這種煎餅比較厚些，水分含的也較多，因爲管理兩三個鏊子，自然無暇去仔細的推薄和推均勻的。這種攤法在青州一帶較多。但是煎餅太厚了就不好吃，所以爲講究吃煎餅者，所不歡迎。攤煎餅的技能，全在推的工夫，技能愈高，煎餅亦愈攤的薄而均勻，這點技能，大概要有一二十天以至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學得完善。擅長這種技能的男子比較甚少，一般家庭內都是由婦女來擔任。所以泰安和青州一帶的婦女，都須學習攤煎餅，同時人家娶媳婦，亦以能攤煎餅與否作爲主要的選擇條件之一。

### 煎餅之養分

泰安的勞動者普通每頓吃食煎餅的數量，大概每人自四五張至七八張不等，換言之，每人每天要吃一斤以至一斤半的食物。煎餅中所含的養分，究竟能否滿

足人們必需的營養素？實需要一個確切的答復。特別是一般人均以煎餅爲「下等食糧」，和窩窩頭一樣被人輕視着，所以我們應該科學地來研究一下。

據德國化學家斐脫（Voit）之研究，每個體重一百公斤的人，每天作普通的勞動十小時之男子，其所需要各種營養素之分量，爲蛋白質一一八公分，脂肪五六公分，炭水化合物五〇〇公分，總熱量爲三〇·五·五卡羅里。我國人的身體一般較小，我們現在假定普通男子的體重爲六〇公斤，即約百斤，則所需營養素的分量，（女子約需總量的五分之四）是。

蛋白質	一〇一公分	合	二、七兩
脂肪	四四公分	合	一、二兩
炭水化合物	四二八公分	合	一、二兩
熱量	二六七八卡羅里		

這種學說，只是實際經驗的結論，似尚不能作爲學理的唯一的標準。因爲現在又有些學者，以爲蛋白質和脂肪的分量，不免太多，甚至有主張完全素食的。

我們現却不管這種爭論，姑即以此作爲標準來比較煎餅所含之養分。

要知煎餅之養分，應該先分析製造煎餅之糧食中的化學成分，及其與他種糧食之比較，下表就是各種糧食的化學分析：

食 物 名 稱	百 分	營養素						發熱量 (卡)
		水	蛋白質	脂 肪	無 機 鹽	粗纖維	炭水化合物	
高粱黃色	五・六	九・七	四・一	一・一	一・五	七八・〇	三八八	二二七三
高粱紅色	九・〇	九・五	四・七	二・五	一・八	七二・五	三七〇	二〇七二
高粱白色	二三・七	一一・九	五・〇	三・〇	一・六	六四・八	三五二	一九七一
玉蜀黍黃色	九・〇	八・六	四・四	一・八	一・三	七四・九	三七四	二〇九四
玉蜀黍白色	一四・五	七・七	二・一	一・二	二・〇	七二・五	三四〇	一九〇四
小米	一〇・五	九・七	一・七	一・四	〇・一	七六・六	三六一	二〇二二
黃豆	八・八	三九・二	一七・四	五・〇	四・二	二五・四	四一五	二三二四
米 (上等)	一〇・一	九・六	〇・二	〇・三	〇・三	七九・六	三五九	二〇一〇

米（次等）	一一・〇	八・五	〇・三	〇・六	〇・五	七九・一	三五三	一九七七
米（下等）	一一・九	七・三	〇・四	一・〇	〇・七	七八・七	三四八	一九四九
黃米（黍）	一〇・六	九・七	〇・九	一・〇	〇・九	七六・九	三五五	一九八八
小麥（整粒）	一〇・五	一二・四	一・四	二・五	二・四	七〇・八	三四五	一九三二
白麵	一二・八	一〇・八	一・一	〇・五	〇・二	七四・八	三五二	一九七一
黑麵	一三・四	一二・〇	〇・八	一・五	一・九	七〇・四	三三七	一八八七
雜麵	一八・三	二〇・二	〇・八	五・三	二・三	五三・二	三〇〇	一六八〇

依照上表之食物化學的分析，就各食物所含之營養素的豐富說，首先以黃豆爲最優良，牠的蛋白質佔有百分之三九・二，脂肪佔有百分之一七・四，這是任何植物所趕不上的。在吃米或麵食的人們，只有在菜蔬中嘗到黃豆的滋味，但吃煎餅的人們，就可以在飯食中包含有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二的黃豆成份了。我們現在再將高粱、棒子、小米三種與其他糧食比較看一看。就其所含的蛋白質說，高粱（紅色）爲百分之九・五，小米爲百分之九・七，棒子（黃色）爲百分

之八・六；這個成分較之白麵的百分之一〇・八，黑麵的百分之十二，雜麵的百分之二〇・一，雖是較少，但較之上等白米的百分之九・六，次等白米的百分之八・五，下等白米百分之七・三，反是較多的。就所含脂肪說，普通食物中，除黃豆的脂肪最多，計有百分之十七・四外，就要算棒子、高粱、小米爲次多。因爲棒子的脂肪量爲百分之四・四，高粱（紅色）爲百分之四・七，小米爲百分之一・七，而白麵不過百分之一・一，黑麵雜麵均不過百分之〇・八，白米更不過百分之〇・二十一〇・四。再就所含炭水化合物（澱粉質）說，高粱爲百分之十七・八，小米爲百分之七・六・六，棒子爲百分之七・四・九，可稱爲優良，因爲這種成分，僅低於白米的百分之七八・七以至七九・六，而較多於白麵的百分之七・四・六，其他如黑麵雜麵等則相差更多了。至於人類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無機鹽，除雜麵外，亦以黃豆、高粱、棒子、小米爲最多，其含量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一・四，均在白米麵粉之上的。因此，就每斤發熱量來比較，自然仍以黃豆之二三二四卡羅里爲最多，其次爲棒子的（黃色）二〇九四卡，高粱（紅色的），黃色

的爲二二七三卡）的二〇七二卡，再次爲小米的二〇二二卡等爲最多，其次如上等白米不過二〇一〇卡，白麵不過爲一九七一卡而已。總之，就經濟之原料的各種化學分析，質量都屬上等，一般的說，不僅不比白米白麵爲次，並更較優良，況且煎餅是混合數種糧食而製造，可以「取長補短」，這是爲其他各種食物所不及的。大概山東人的體格之壯大，於吃煎餅或雜糧的關係可以說頗爲不小。不過煎餅亦有一個重要的缺點，就是煎餅的各項原料，所含粗纖維的成分，一般的較高，如黃豆爲百分之四・二，高粱（紅色）爲百分之一・八，棒子（黃色）爲百分之一・三，這都是較高於白麵的百分之〇・二，白米的百分之〇・二十一〇・七的，只有小米所佔的成分百分之〇・一二爲最低，又爲其他任何食物所趕不上的。粗纖維的壞處，就是不易消化；所以煎餅的營養素成分雖高，而能爲人體消化器官所消化而吸收的養分，不免因之稍爲減色了。所以煎餅，最適合於吃雜糧者的胃口，吃麵食者亦易消化，對於米食者消化較難，不過這亦不是絕對的，我們不見許多米食區域的貧民，亦是全靠雜糧爲生的麼？

在上面一般的分析了各種糧食的化學成分以後，我們現在再來具體的把煎餅分析一下，看看煎餅內的化學成分究竟怎樣，是不是可以滿足人們之營養素的需要？

由我們實地調查的結果，每個中年男子的普通勞動者，每頓可吃煎餅四五張至七八張，就分量說，每天每人要吃一斤至一斤半的煎餅，現在我們假定每人一天所吃的煎餅量平均爲一斤四兩。因爲煎餅內的水分，並不比原料內所含的水分更多，譬如六十斤的原料，所攤成的煎餅，亦不過六十多斤，如果攤的很薄而脆的話，就只能剛趕上六十斤的原量了。所以一斤四兩的煎餅食量，差不多等於實在的糧食分量。

現在即以前面所引之通行的五式，選取乙式第一種和丁式第二種爲例、

乙式第一種，原料的配合比例爲高粱十五斤，棒子五斤，小米十斤，如果一天吃此種煎餅一斤四兩，則所獲得之營養素和熱量如下：

脂肪

〇、七三兩

炭水化合物

一四、八五兩

總熱量

二八二八卡

丁式第二種原料的配合比例爲小米五斤，高粱五斤，黃豆二斤，在一斤四兩的食量下，可獲得之營養素和熱量是：

蛋白質

二、九一兩

脂肪

一、一一兩

炭水化合物

一三、二五兩

總熱量

二八五七卡

就上列二種煎餅比較觀看，由營養素發生的總熱量上，都已超過了標準量之二六八七卡，乙式多一四一卡，丁式多一八〇卡。不過此種熱量之超過，大半由於炭水化合物所發生。如乙式的炭水化合物爲一四·八五兩，丁式爲一三·二五兩，均較標準量一二·五兩爲多。至就蛋白質和脂肪說，則乙式較標準量爲差，

標準量的蛋白質應爲二・七兩，脂肪應爲一・二兩，而乙式則不過一・九九兩和○・七三兩，計減少○・七一兩和○・四三兩之多。至於丁式的脂肪量雖較少○・○九兩，但蛋白質則多○・二二兩。一般的說起來，小米高粱和黃豆所製的煎餅，似乎堪稱爲優良的食物了。因爲我國人民素少肉食的經濟條件，對於蛋白質脂肪質的吸收，大都來自糧食中，如今煎餅中的此種質量，只較肉食的德國人之標準比例稍差，更可見煎餅質量之優良。同時，食煎餅雜糧的人民，較之米食的人民，更少吃肉食的菜蔬，但其體格反比南方的米食者爲高大，此或亦因雜糧內營養素較多的緣故。況且煎餅這種食物，很易於加入他種養分豐富的物質，如有少數富裕的人家，每在原料中摻入三五斤小麥；又如鷄子，特別是鷄蛋黃亦是可能加入的，不過分量須在百分之五以下，這才不影響到煎餅的攤薄與水分的蒸發。這種加入新原料的改良，特別是補救脂肪的缺少上，是有必要而且可能的。

## 煎餅與抗日軍食

就煎餅的各種條件說，的確可以成爲解決抗日軍食的重要方法之一。我們的認識有如下的幾點：

第一，抗日戰爭是一個長期的戰爭，戰爭期間也許要延長至四五年以上的；抗日戰爭又是一個廣大的羣衆的戰爭，全國的民衆，都要直接間接的參加戰事，而第一線和第二線的戰士人數，必然是多至數千萬人的。要解決這個軍食的問題，應該利用各種所能生產的食糧；煎餅自然亦可成爲重要的軍糧之一。因爲可作煎餅原料之高粱、棒子、小米和黃豆，已經是我國農產的大宗，而其地位已佔我國民食原料的一半，而比米麥兩種糧食還要重要。況且不論氣候土質之南北的區別，這些農作物幾乎無在不宜的。再就牠們的栽培之簡便，抵抗水旱之能力，以及收獲量之豐富等，更是我們在抗日戰爭中，最易解決軍食以至民食的一個方法。

第二，煎餅的最大優點，是能經過一二個月的期間而不變味和敗壞，這又是軍食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過去的軍食都是水分太多的米飯、饅頭、小米飯等，恰是最易霉爛的東西，無論食物的品質怎樣良好，一至霉壞，就會失掉食品的効力的。勉強士兵吃霉爛了的食物，不僅不合衛生，並且要大大地減少戰士之戰鬥力的，而煎餅恰好可以補足這個大缺陷。

第三，煎餅是一種乾糧。假如每個士兵要攜帶一天的食物，帶米飯需要二斤，帶煎餅則僅需要一斤四兩就夠了。自然我們並不是說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食品比煎餅更為適宜，更為輕便，我們只是認為在中國的現存條件之下，若煎餅的重量，能減少米食的八分之三，就是值得重視的了。至於攜帶和吃食時的簡便，亦是煎餅的不可忽視的優點。

第四，煎餅的原料，在我國是一種易於生產並能大量生產的物品。生產費既較低廉，市場價格，亦幾是食糧中之最便宜者。假如米食和麵食的人們，食糧的費用每月須有三圓，那末，吃煎餅時有兩圓錢就可以了。我們不僅不反對，並且

力求中國軍士能吃麵包餅乾，或更好的食物，而提高和改良士兵的生活，不過在當前抗日戰爭中，在現在政治經濟條件下，首先一步我們不能不在現有的可能條件上，解決當前的問題，而在問題的解決過程內，力求改良與進步。那末，僅此減少糧食費用三分之一的支出一件事，至少每年就可以省出幾千萬圓來作更有益於抗日的事業了。

第五，煎餅的化學成分，如上面所分析，雖不能說是最上等的食物，但其所含的營養素與熱量，已頗夠一個戰士的生理之需要。如果我們一方面能注意製造過程中的清潔，另一方面研求脂肪成分之增加，則不難使煎餅成爲目前最完善的軍食之一了。

總而言之，煎餅的各種優點，頗能適合軍食之需要；特別是當前抗日軍食的解決，更不能不視煎餅爲最好的食物之一。在這裏，我們聲明一句，並不是以煎餅爲抗日軍食的唯一食物，我們只是說煎餅可以作主要的軍食之一。我們爲抗日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眞誠地歡迎各種更好的軍食之發明或改良，同時亦歡迎對於

煎餅改良之意見。

## 四 抗日軍食的一個計劃

我國的門戶，是完全開放的。不僅是我們的國境上到處洞開，任人出入；不僅是東北四省的四百萬方里的土地，一旦變成所謂「外國」，而且我國的沿江沿海，和內地的「通商大埠」，亦就成了日帝國主義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之堡壘。

這些名義上還屬於中國的領土，在平時已成爲帝國主義侵略的大本營，一至戰時，自然又馬上變爲武力進攻的前線，我們還清晰的記憶着，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從察哈爾的省境起，沿着長城線經過河北省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的沿海以至福建的廈門，在這幾千里的邊線上和長江流域的自南京到武漢，都隨時隨地成爲日帝國主義武力進攻的目的，「一二八」的淞滬之戰，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所以抗日戰爭，必須是堅固的防守住這一廣遠的戰線，經過頑強的戰鬥以後，才能進而收復失地。我們必須在這種前提的認定之下，來試作一個軍食的具

## 體計劃。

既然我國的沿海沿江之都市，有隨時變爲戰爭的前線之可能，所以籌供軍食之中心地，決不適宜於瀋寧津平漢等「現代化」的都市。我們認爲在防守上交通上最適宜者，莫如陝西的西安和山西的太原，現在即以西安爲中心的來設計煎餅軍食的製造。這個計劃的大綱，可條舉如下：

一、我們要說明抗日戰爭中有多少人民參加戰鬥，這自然不是可以簡單答覆的。因爲這個民族存亡的戰爭，必然是全國民衆的總動員，同時，參加前線的戰士，亦因戰線的廣大，戰期的延長，而可以增加至數千萬人。我們現作一個戰略的估計；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由察哈爾至上海的戰線上，至少要有四十萬人，二星期後，須增加至八十萬人，再二星期後，又須增加一倍，計一百六十萬人，二個月內增加至六百四十萬人參加戰線，假如戰爭可以延長四五年，而日帝國主義動員的最高限度爲一千二百萬人。那末，我國動員的抗日戰士，必須達到四千萬人。

二、四千萬前線的戰士，自然不是同時都在火線上，亦不一定都是長期的吃食乾糧，戰爭較為緩和或輪到休息的時候，必須有新鮮食物以滿足戰士的生理之要求，吃食乾糧時，亦不一定都以煎餅為食物，也許還有米麵等乾糧之供給，不過無論如何，煎餅是可以居為主要的乾糧之地位。我們假定長年參加戰場的戰士，為二千萬人，而其以煎餅為軍食的不過居半數即一千萬人。我們即以此數來計劃煎餅之生產。士兵的食量，假定與普通勞動者相同，即每人每天平均一斤四兩，則一千萬人每日所需的食糧，共為三千二百五十萬斤，一月所需的為三萬萬七千五百萬斤，一年所需的為四十五萬萬六千二百五十萬斤。這種煎餅糧食之配合，假定是小米、高粱、棒子各五，黃豆二之比例，則每日需要小米、高粱、棒子各為三百六十七萬五千斤，黃豆一百四十七萬斤；每月需小米、高粱、棒子各一萬萬一千〇二萬五千斤，黃豆四千四百十萬斤；每年需要小米、高粱、棒子各十三萬萬四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斤，黃豆五萬萬三千六百五十五萬斤。關於此種大量的糧食之籌集，第一步可在陝西、河南、山西及湖北等省去收買；這幾省

平常年的產量，高粱爲四十萬萬六千七百六十五萬斤，棒子爲三十五萬萬斤，小米爲五十三萬萬七千七百四十一萬斤，黃豆爲二十六萬萬六千六百二十一萬斤，這一巨大的產量，自然可以供給煎餅糧食之一部份的可能。第二步可向山東、河北、江蘇、安徽等省收買而轉屯於軍需中心地；這幾省平常年產量爲高粱七十七萬萬八千九百七十四萬斤，棒子三十四萬萬七千三百五十二萬斤，小米七十四萬萬五千九百八十一萬斤，黃豆八十萬萬八千三百一十四萬斤，這又使我們大量糧食的購買和貯蓄，易於進行。第三步則須有計劃的鼓勵人民對於軍食糧食之種植，尤其是陝西爲中心的周圍各地之增多生產。這件事，以我國自然條件的優厚，加以民族意識的刺激，和對於農業和農村經濟上各種阻力之廢除，自不難達到充分供給民食和軍食之目的。至於軍糧的運輸，當利用江河之航路，及陸地之大路，組織成嚴密的交通線，而達運輸的迅速穩妥之目的。關於具體的辦法，因牽涉太廣，此處不說了。

三、製造煎餅的第一個重要工具的磨，究竟要製備多少副呢？每副磨每日如

工作十小時，平均可磨糧食六百斤，則每日消費糧食一千二百五十萬斤，約須石磨二萬一千副，這種磨的石料，自然很易尋找的，如秦嶺山脈，就很富於大石的。此外附屬於磨的工具，如磨架，如浸糧食的器具，和盛糊子的器具，以及挽磨的牲口等，亦須按照磨的數量之需要而一一購辦起來。如果我們能有更好的方法，增加每副磨的生產量，如以輪流工作方法，每天工作二十小時，則磨的數量可以減少一半，又如上海的豆腐店，改使電力為動力，使磨的生產力增大至一千斤左右，則磨的數量就可以減少至一萬二千餘副了。

四、至於需要多少鏊子呢？假如每個攤煎餅者，平均每點鐘攤餅四十張至五十張，則每日工作以十小時計，約可生產煎餅四百張至五百張，即約等於煎餅糧食六十斤，那末，每日一千二百五十萬斤的煎餅糧食，須得鏊子二十萬個，才能攤完。關於這種鏊子的製造，甚為簡單，凡是能以生鐵製造器具的工人，差不多都能製造。問題比較重要的，還是鑄造鏊子的原料，二十萬個鏊子，就得四五百萬斤的生鐵。這個問題，我們研究的結果，覺得亦易解決。我國西北各省，都

是富於鐵礦的貯藏，尤以太行山脈嵐山脈爲最富。譬如現在山西省每年土法生產的生鐵，約有六萬餘噸，河南省有一萬噸，陝西省有五千噸，這些鐵的產量，不是夠鑄造四百幾十萬個鏊子嗎？現在山西南部舊潞安澤州二府屬，就是產鐵的著名地方；由此以供給西安之需要，交通上亦甚是便利的。即使鐵的別方面需要還很多，我們還可以有計劃的統制，增加產量至數倍以上的。同時，我們亦可改良燃料和技術，而增進攤煎餅者的效率，那麼，鏊子的數量實際上可以大大地減少的，此不過就其最高的數量而言罷。其他附屬於鏊子的器具，如鐵勺，推子及盆等，亦自然要視鏊子的數量而製備的。

五、有了原料和器具，最重要的就是攤煎餅的工人。攤煎餅的鏊子，既有二十萬個，亦必須要有二十萬個攤煎餅的工人。這個人的問題，實是較煩難的。因爲以煎餅爲食糧的區域，既僅限於山東的舊泰安府及青州府，所以別的地方人，是不善這種技術的，同時，我們要從山東僱傭二十萬個工人，去西安攤煎餅，亦未免是太不經濟的一件事。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在西安附近招僱製煎餅的工

人，而由山東舊泰安府屬招聘二百個或四百個的技師去。由這些技師們訓練新僱的工人，經過二二星期，就可以成爲熟練的工人。這些熟練工人，一方面既可自己工作，同時又可爲新工人的技師，這樣一來，不過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就有所需要的技術精良的煎餅工人了。同時，希望這種攤煎餅的技術工人，多多的由婦女擔任，這個提議，並不是薄視婦女，以爲婦女應做此種「家庭手工業」，反之，我們以爲在抗日的民族戰爭中，佔人口半數的婦女，在前線在後防，都是要佔一個重要的地位的。在理論上事實上我們都是贊成男女平等的，可是在戰爭的實際上，女子，特別是在現代的中國婦女，最大多數的不僅知識上受了社會制度的戕賊，並且身體上亦受了社會制度的戕賊，（如裹小腳），所以這種後防的軍食之製造，是比較適宜於婦女的。其實，前線的戰士，與後防的戰士，其重要實無所軒輊，並且這種「分工合作」，正是我國民衆之爭求民族獨立自由的必要條件。

六、在我國現有的條件下，關於煎餅的燃料，大半還只有以草本的植物充當

的。燃料的消費量，大概要當煎餅糧食量的一倍半至二倍，換句話說，即是一百斤煎餅，須要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的燃料。如果軍食之一年的消費量爲四十五萬萬斤，那末，燃料的準備，須有七八十萬萬斤。此數量的燃料之供給，在陝西鄰近地方，自然尙不至發生絕對的困難。不過這種積體積龐大的東西，在運輸上既不經濟，而此原始的燃料，亦實影響到生產的低小。所以我們希望真正忠誠於民族，熱心於抗日的科學家，在研究增加抗日戰鬥力的各種努力中，分一部分力量來研究軍食的改良。而怎樣改善煎餅和煎餅的燃料問題，亦就是值得專心研究的一件要事。我們在這裏，亦可以提出若干意見，煎餅的火力，固然不宜於太烈，而最主要的還在火力均勻，能由攤煎餅者隨時控制。在這樣的原則下，只要把生火器具，稍加改造（其實攤煎餅就沒有生火器具的），使能控制熱力，則煤炭等燃料，同樣可以應用，並且可以增加煎餅之生產量的。（北平天津一帶，賣煎餅的小販，就是用煤炭作燃料的），則燃料問題是可以得到較經濟的解決了。山西河南和陝西，是我國煤藏最富的地方，而無煙煤又是適

宜於製造飲食之用的。

最後，我們在抗日戰爭中，同時應努力我們經濟基礎之改造，依據自然的和社會的條件，力求生產進於「現代化」，就製造煎餅說，如電爐之採用，實為可能而必要的，因為我們認定和努力的抗日戰爭，首先是爭取中國之政治的自由平等，同時亦要爭取中國之經濟的自由平等的呵！

我們這個綱領式的計劃，自著不具體和不完全的缺點，同時，各種意見，亦許在實行中，需要很多的修正。這是有待於專家之努力的。我們的意見，並不是專家的技術設計，不過是怎樣遂行抗日並取得抗日之勝利的一種提示。同時，我們計議以煎餅為抗日軍食之一，決沒有並且不應該曲解為違反進化的「復古運動」。我們十分清楚的知道煎餅之製造，完全是手工業的生產；煎餅之品質亦不是各種食品中之優良者。我們所以不嫌笨拙的提出煎餅的主張和計劃，因為我們更萬分清楚的認識抗日戰爭，對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係之重要，並且抗日戰爭不許有任何藉口，以打算延緩和消滅抗日戰爭之繼續與擴大。三年來恥辱的教

訓，使全國民衆慘痛的記着，「一切物質不如人或落後」的藉口，都是「長他人之志氣」的甘心願意作亡國奴罷了。所以我們確定的把握住一切抗日戰爭之物質準備，都應該在我國現有的客觀條件上來解決。不要單嫌我們的各種物質力量之落後（這正是我們的不長進的先人，懼怕和依附帝國主義之結果），最主要的是將一切可能的力量，都有計劃的應用到抗日戰爭上來。同時，亦不要以此種「落後」的力量而誇大和保守，不僅要記着自己的缺點，並且要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時時刻刻的力求革新和進步，以企一切物質準備都完全進到「現代化」的生產和組織。我們的物質準備，自然要受經濟的社會的客觀條件之限制與決定，但是我們一定要不氣餒，不虛驕，握住現實，有辦法，有計劃，有目的，於實踐中求統一，於奮鬥中求進步。這是要希望免去許多惡意的歪曲，而取得每一個爲國家爲社會奮鬥的人們之諒解的。

## 五 對於抗日戰爭之應有的認識和前途

我國在帝國主義近百年來的侵略下，一方面因為統治者的昏瞞與媚外，另一方面又因為民衆的解放運動之失敗，遂使整個的政治經濟，日益墮入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九一八」事變的發動，不僅是帝國主義對我國更進一步的侵略，不僅是併吞我國東北的一部分土地，實更是爲經濟的政治的危機弄瘋狂了的日帝國主義之完全吞併中國的最後一着。日帝國主義綜合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於一爐的侵略政策，無論是內田對其他帝國主義的「焦土外交」或廣田的「協和外交」，無論是對華的「水鳥外交」或「啄木鳥外交」，均不過在國際共管的鬪爭聲中變中國爲日本名實一致的殖民地而已。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一方面是繼續並完成中華民族解放之歷史任務，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民衆之「死中求生」的最後一個機會。我們能夠從抗日戰爭中爭取最後的勝利，則不僅東北失地可以收復，並且帝國主義所給予我國的致命束縛，以及依附於帝國主義之下的各種勢力，可

得廓清，而躋中國於自由平等的國際地位，開闢一條政治經濟之自由發展的光明坦途，不然的話，無論是明送領土的「不抵抗」，或者是暗贈主權的「提攜」與「合作」，都是最後要將中國完全變成殖民地。千真萬確的歷史，已經很明顯地教訓了中國的大眾。所以中國的民衆，應該清楚的認識並把握這個生存與死亡的歧路。我們不應該「破落戶」樣的貪圖毒藥丸之飴糖皮的甘甜，不惜「飲鴆止渴」。「苟延殘喘」，亦許更能投合「最小犧牲」和「不肯犧牲」者的卑鄙心理，但是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的子孫，換句話說，即是整個的民族，必然陷於「萬劫不復」之亡國道路。反之，我們已經認清了一切「忍辱含垢」的「投機取巧」，都是「此路不通」的死胡同，唯一的出路，祇是以巨大的犧牲，才能換得民族的自由平等。並且堅決的認識民族的自由平等，就是民衆的自由平等之前提，而民衆的自由平等之獲得，又是民族的自由平等之保障。所以我們要不怕任何的困難，不惜任何的犧牲，「唯力是視」的集中一切力量以求抗日戰爭之勝利，以求民族的和民衆的自由平等之實現。

其次，這一莊嚴偉大的抗日戰爭，決不是少數人的呼籲，而是自我們祖宗以來的整個民族之要求，掙脫奴隸地位取得自由人地位之心坎裏的要求。雖然這個偉大的要求，因為帝國主義和統治者的種種鎮壓和麻痺，窒息了民衆的思想，阻礙了民衆的鬥爭，甚至造成了麻木不仁的「混吃等死」之亡國風氣；但是，我們相信只要舉出了爭取自由平等的旗幟，只要揭破了一切麻醉作用的眞面目，我們就可以從民衆的心坎裏獲得熱烈同情之應聲，同時亦就可以取得「萬衆一心」的勇敢壯烈之行動。所以我們敢堅決的相信，抗日是一個廣大民衆的要求，同時，抗日亦就是一種無限的民衆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抗日必然獲得最後勝利的基礎和保證。

再次，現在的世界，一方面是壓迫者窮兇極惡的時代，另一方面是被壓迫者爭求解放的時代。壓迫者固每易在相互衝突中「沆瀣一氣」，同時被壓迫者亦自然是「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所以我們爲求解放的抗日戰爭，一定可以獲得世界被壓迫者之直接間接的援助，而幫助並保證抗日戰爭之迅速的成功。對於

「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自然應該有一個堅決的信心，同時，「相需相助」的鼓勵我們之抗日的決心與急進。不過，我們還要不嫌重複的說，如果願意利用一切國際的援助和機會，首先還是確定自己的抗日決心，加緊對於抗日的努力，這是我們對於國際的助力之應有的正確認識。因為外來的助力，始終只是一種幫助的力量，決定的力量，還是我們自己。常言說的好，「諸葛亮扶不起劉阿斗」，這就是說，自己先不爭氣，結果只是白費了一切的同情與援助。

最後，我們爲要確定抗日的決心和努力，就要在日常的實際行動中來準備，換句話說，卽是要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來從事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準備，這種「準備」，不僅是要馬上「兌現」；其實這種準備的本身，就是抗日戰爭過程的一部份。如我們在這本小書中所研究的軍食問題，就是需要馬上從各方面實行準備起來的。又如武器問題，我們應該首先將我們所有的飛機、大砲、坦克車，我們所有的機關槍、步槍、手槍，我們所有的大刀戈矛以至斧頭鋤頭，簡單的說，

即是我國所有一切可以作爲武器的器械，首先集中起來爲抗日而使用；同時，用一切力量求抗日武器的改進與充實，以達到抗日的武器都是最銳利的武器。至於我們的精神和習慣，同樣的要以抗日爲任務而興奮起來，並且要以抗日的利便爲目標，而改革和培養。譬如，軍隊的食品，主要的是冷食的乾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要把那種吃熱的稀的食品之習慣改革掉，而養成吃冷的乾的之習慣；又如軍隊生活中是喝冷開水洗冷水浴，我們就要在日常生活中，把那喝熱開水，熱水洗臉洗澡的習慣，毫不留戀的改去，而養成合乎衛生的使用冷水之新習慣。關於這種同類的大小事情，這裏不必一一類舉，但我們都須自覺自動的在爭取抗日最後勝利的目的下，一一實行起來。同時，無論我們的思想或言論，都須時時刻刻的緊抓着抗日的意識，堅決的相信，「抗日是唯一的出路」，「抗日是必然獲得最後的勝利」，真正做到「念不忘抗日，事事不離抗日」；譬如我們的軍歌，一定要把李鴻章式的「敗國休想」，或者什麼「共存共榮」等統統根本廢棄了，而代以「有日無我，有我無日」決死戰的歌曲。總而言之，我們的一切生

活、習慣，一切思想，行動，一切物質設備，都要爲抗日而準備，爲抗日而改革，爲抗日而生產，爲抗日而使用，爲抗日而犧牲；並且我們的民衆，還要爲抗日而各種各式的團結起來，武裝起來，從與一切抗日障礙的奮鬥中，達到擴大抗日戰爭，而獲得抗日之完全勝利。

我們的主觀上，自然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抗日的積極份子，甚至於昨天的「漢奸」，我們亦熱烈的希望他翻然覺悟，由帝國主義的工具，變爲民族革命的戰士。因爲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不是那一系那一派或那一個人的專利事業，而是中國人民的當前的歷史任務。我們爲着中華民族的前途，不能不要求全國人民起來完成這一歷史任務。但是客觀的歷史教訓，却已屢次的告訴我們，那些寄生於帝國主義勢力下和站在封建剝削制度上的人們，在帝國主義侵略過程中，特別在革命運動發展中，使他們意識的背叛了民族，甘心願意的替帝國主義作爪牙，甚至比帝國主義還要毒辣的破壞抗日戰爭了！因此，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任務，不得不由貧苦的受壓迫的勞苦大衆，和有民族意識的人們，來擔負，來完

成。因此，我們特別要求全國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民衆，要求有民族意識的無論屬於那一階層的人士，要求有「良心」的實力者和社會團體，要求為中國的解放而奮鬥的各黨派，一齊來切切實實的站在抗日的立場上，時時處處的為抗日而奮鬥，「有日無我，有我無日」的不斷奮鬥着，不斷犧牲着，那麼，不但東北四省可以收回，不但帝國主義的一切束縛，可以解除，而且國家的社會的自由平等，一定可以實現。所以我們最肯定的號召於中國民衆之前：抗日是中華民族之國家的唯一光明出路，同時，亦是中國民衆之生活的唯一幸福出路哩！



A541 212 0021 9287B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煎餅

抗日與軍食

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著者

馮玉祥

出版者

時事研究

天津法租界

代售處

各埠大書局

